

## 东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目录

- 一、广征博采、存真求实……………李成春 (1)
- 二、回忆同桌同学蒋纬国……………姚龙标 (3)
- 三、硝烟烽火忆当年……………曹洪文 (7)
- 四、活捉日伪区长王毓恭……………王仲范 (32)
- 五、智擒郎笑山……………齐 禹 (38)
- 六、枣棵杨惨案始末……朱成震 曹代岭 (42)
- 七、智勇相辅 制敌取胜……………广典华 (70)
- 八、老东阿县立高级小学的回忆…岳克寒 (83)
- 九、张盛斋传……………杨志高 (92)
- 十、一个知识分子的历程  
——知名人士孙广彬……………曹桂生 (98)
- 十一、杂技之乡话杂技……………曲绪宏(105)
- 十二、略谈东阿的戏剧……………玉水 绪宏(116)
- 十三、一代名人陈宗妣……………鲁 莽(123)

- 十四、隋建《曹植墓神道碑》小记  
.....刘玉新(129)
- 十五、“娃娃县令”尹子奇.....周长凯(139)
- 十六、铜城夜谭.....鲁 莽(142)
- 十七、对古志书中有关东阿记述有  
误的校勘.....丁小石(177)

## 广征博采 存真求实

李成春

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受益当今，惠及后代，是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对于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丰富文史知识，补历史文献之不足，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县依山傍水，历史悠久，物阜民丰，人杰地灵。各类文史资料极为丰富。但由于县域的多次变化，县城的频繁迁徙，储存文献寥寥无几，这与我们所处的战略地位与文明古县，不太相称，有待各界人士搜集整理。我们要广征博采，存真求实，既有史料价值，又有地方特色；把可存性、真实性、趣味性溶于一体。高举爱国主义

旗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广泛征集，秉笔直书。以三亲材料为主，有史必录，史重于文，多说并存，文责自负。

东阿《文史资料选辑》，在县委、政府和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已编撰印刷三辑。承蒙各位读者，不吝赐教，正在改进提高。计划刷新版面，增加内容，新辟栏目，提高质量。力求使其成为传播历史知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园地；成为政治、经济改革的借鉴和参考；成为继承传统、更新观念的爱国爱乡乡土教材。有些学术问题，还可各抒己见，展开争鸣。

东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任重道远，诚恳地希望革命前辈和各界仁人志士，社会贤达，和一切热爱文史工作的朋友，给予大力协助。有些资料，面临人去史亡的局面，更需急起抢救。研究过去，正是为了现在和未来。

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祖国统一大业和四化建设，赋予文史资料工作以重任，我们要在

广征博采，存真求实的方针下，使《文史资料选辑》，成为我县精神文明建设百花园中的一朵具有文史特色的小花。常开常新，香艳永存。

## 回忆同桌同学蒋纬国

姚 龙 标

回顾当年在西安南黄埔村，一战区将校学习班学习时，我曾和蒋纬国有过同桌同学的经历。

事情是这样的：蒋纬国从德国学军事回来，蒋介石把他托付给胡宗南，叫他从基层作起。胡叫他到第一师当连长，并以特殊关系（按规定连长是尉官，不能参加将校班学习的，皇太子例外），叫他到将校班学习。蒋介石把大儿子起名叫经国，二儿子起名纬国，文经武纬，象织布一样，将来把中国统治起来。把大儿子送到苏联学政治，把二儿子送到德国学军事。将校班是训练和笼罗人才的学府。叫蒋纬国到将校班学习，是叫

他广交天下士，为将来打下基础，是别有用心的。

该班领导人，有行营主任兼司令长官朱绍良，副长官胡宗南，兵团司令裴昌会、陶峙岳（两位将军皆起义）、李延年等人。蒋纬国和我安排在第一组，全组八人，七人是黄埔军校和陆大毕业的。第一师师长任我们的组长，组长叫我和蒋纬国同桌，说他才从国外回来，汉语稍差，讲课有听不懂处，要我帮助他。当时，我们都是爱国青年，抗战救亡心切。所以相处甚为融洽。为促进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去年六月间，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以后，我曾修书一封，题为《致前一战区将校班同桌同学蒋纬国书》寄同学会徐向前会长收转，用意是为祖国统一，想尽我个人一点微薄的力量。原函稿如下：

### **致前一战区将校班同桌同学蒋纬国书**

纬国同学：

43年冬在西安南黄埔村一战区将校班学习

时，咱同组同桌。毕业分别时，您送我上车，从那一别，四十多年未见，天各一方，感慨万千。历史的经验值得吸取：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成功。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胜利。北伐的情景我等未见。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战。你我都亲身参加。日寇入侵，“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全国地无分南北，人不论老少，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全国齐动员，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八年抗战击败日寇，赢得胜利。现在祖国大陆，工农业大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提高，亩产双千斤粮、双百斤皮棉，增产丰收，早已成为现实的事。尤其实行对外开放，引进技术以来，经济和生产形势大好。胰岛素的发明，同步通信卫星上天，工业科学技术已步入世界先进行列。民富国强，世界公认。今日台湾，孤悬海外，受制于人，海峡两岸骨肉不能团聚。这对全国与地方的进一步发展，均属不利。实为憾事！祖国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人心

所向，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当年孙中山先生教导说：“团结国民幸福，分裂人民受害”。希望您和令兄经国先生，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抛弃前嫌，接受对等谈判，与共产党人重新携起手来，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同全国人民一道，为振兴中华，为实行孙总理遗教，再立新功。切愿您和令兄经国先生，毋背“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的良知名言，以垂教天下后世。千秋功罪，系于一念。忝属学友，敢布腹心，至望三思。佇候明教。

此 致

敬 礼！

前一战区将校班同桌同学

姚龙标

八五年六月二十日

# 硝烟烽火忆当年

## (一) 日伪内幕及其覆灭

曹洪文

抗日战争结束，已经过去四十一年。如今的东阿，河山多娇，生机盎然。人民在和平的阳光下，正在进行四化建设。听不到枪声，看不到烽火，血与火的岁月逝去了，生死一瞬间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过去，这里确曾硝烟滚滚，烽火连天。日本鬼子的刺刀，汉奸伪顽的凶暴，使不少抗日军民长眠地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苦战八年，才消灭了日伪顽，赢来了今日的幸福。

胜利属于正义的人们，正义之师必胜。

胜利属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人民。

我，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今将我亲历、亲闻

回忆于下，奉献给故乡父老和年轻的一代。愿大家从中得到一点启迪，以更好的挺进于振兴中华的新的历史征程。

### 一，东阿日伪政府内幕

东阿县城，于一九三八年三月被日寇占领。伪县府班子，在济南已经组成。后来随着他们的刺刀、机枪，同时来到了东阿。伪县长张勉之，观城人，行伍出身，带来一个贴身乔姓秘书和十八个伪职要员。并由日伪济南道保安部队派来旧军人出身的张吉春任伪副大队长，来东阿组建日伪机构。随他一起来的心腹干将是刘兴桥。五月份正式宣布伪县政府成立，一批民族败类、地痞流氓，也开始了卖身投靠，助桀为虐。香山的李庆江，南谭的孟继钟组建了伪巡警队，专司抓人办案，刺探我军事情况，是伪县长忠实走狗。我六支队李道松，黄河支队苏虎臣，就是他们杀害的。在李、孟直接策划下，伪县府组成了税务、司法、教育、工商等五、六个科，各科均由鬼子

主持。伪政府全面管理，日本派有顾问。教育，日本宣抚班直接领导；司法，日本人铃木负责。伪县府只是为日寇效劳的奴才们组成的傀儡组织，事事都要听从其主子的决定。还有维持会、新民会、盐务局等，都由日本人亲自控制，连当时东阿火车站的站长，都是日本人。

继伪县府成立后，又组织了日伪武装部队。首先成立的是鲁西民团，由当地的地痞流氓民族败类组成。其中有大姜的姜广盈（有名无赖），鱼山的房燕刚（土匪出身），姜沟的吉茂曾（包打官司，独霸姜沟码头的坐地虎）。芦庄土匪头子刘德功为首，带领这批坏蛋，驻防白塔阎家大院，专干绑票、劫路、祸害人民勾当，并经常带领鬼子向抗日部队进攻。三八年十月，冯寿朋（冯二皮）尚未投敌前，驻苦山、狮子宋、张坊一带，阻止鬼子过河，就是鲁西民团带领日本人向张坊一带进攻的。三九年初，伪区、乡筹建，也都就绪。组建县警备队的人员，一是向各区乡

要的壮丁，一是将鲁西民团一部分改编。鲁西民团的头子，有的被杀，有的当了日本特务（如姜广盈）。警备队初建时，只有一个中队，中队长刘兴桥，一小队长贺保连（关山人），二小队长刘东斋，三小队长刘美冉（南谭人）。警察所所长孟广庆（孟继钟侄子），后换刘俊峰。日本宪兵队下边又成立了特务队，开始是张殿英、赵振清，后换孟广福，高学言、乔子明等（均被我镇压）。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人民抗日情绪的高涨，其武装力量不断扩展，警备队由一个中队，改建成两个中队。县长兼上校警备大队长，一大队付张吉春，二大队付贾殿臣，后为周奎齐。下属十个中队。一至五中队张吉春管，六至十中队归二大队。周奎齐曾接刘兴桥，当过一段中队长。调整后各中队长依次是房辉华，宋广林、刘东斋、董茂生（四中队是董茂生、曹传河、刘春都拉起的伪三区小队改编成的）董伯荣、黄继民（后换赵培善）任志清、赵子清（外号赵二虎原

为东平一股土匪，投日本平井宪兵队后改编成八中队，后大部逃跑，队长换赵明久），杜丙乾、石万荣。后来，刘德超投敌后，将其部队改为警备三大队，刘任三大队付。下属五个中队，依次为十一中队长尹德月（后调往守城，换曹洪文），十二中队长曲传义，十三中队长王兆堂，十四中队长邢兆兰，十五中队长张仙洲（后换蔡广会）。

警备队初成立时，一中队驻防鱼山村，张少溪同志派刘廷华、曹立英到鱼山据点找到我，决定叫我在敌伪内部做工作，我和宋广林、房辉华、赵培善、杜丙乾、任玉清是各乡送去的乡丁。

日伪武装组织有十五个警备中队，一个警察队，一个巡警小队、一个宪兵队、一个特务小队，还有一个手枪队（随县长外出）。另外日本头子平井还在石友三处搞来一个童子军中队，约有一百五十人。全县敌伪武装二千三百余人。武器不好，

只有一、二中队各有一挺轻机枪，战斗力较强。因其组成人员，除乡丁外，大部来自国民党专员余仁甫的特务团，他们被我六支队打散后卖壮丁来警备队的。多是城里人，深得敌人信任。往外安据点，也是一、二中队去打好基础，再换其它中队接防。我党敌工工作重点因而也放在这两个中队。从我和刘廷华接上关系后，就利用房辉华、宋广林供给情报。我回到县独立营任侦察员后，也常住广粮门房、宋二人据点内，靠他们给送情报。有次日本准备向孙郭扫荡，夜间，突然从城里到了广粮门据点。当时我正在宋广林处睡觉，日本人就坐在我睡觉的床沿上，命令宋：“孙郭八路的有，立即出发扫荡”。宋立正喊了个“是”！待日本一离屋，把我叫起并送出据点，叫我赶快送信到孙郭。第二天拂晓，我独立营打了个有准备的仗，使敌陷入我重重包围歼击中，打死打伤敌人一百余人。随着我党敌工工作的开展，分区和县都成立了敌工机构。分区敌工科长

是梁仁魁，县敌工部长韩雁北。我党的方针是：深入敌人心脏，掌握敌人行动，严惩首恶，争取协从，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我们杀掉了铁杆汉奸十五中队长张仙洲，特务队长孟广福，乔子明，叛徒周庆印。争取了一中队长房辉华，他曾两次带队一枪不发向我们缴了枪，给抗日武装送武器。由于他有带罪立功表现，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支援了抗日斗争，所以在土改和各个运动中，人民都宽大为怀，不咎既往。我们依靠党的统战政策，和各中队建立了关系，使貌似强大的敌伪力量，失去了战斗力，在我方不伤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全部拔除据点，将日寇驱逐出东阿。

## 二、针锋相对，艰苦斗争

日本鬼子侵占东阿城，伪政权机构和武装组织逐步建起来，于三九年开始向城外扩张，魔爪伸向全县。他们首先在二区斑鸠店，三区广粮门，四区陈店子建起了据点，一区就在城东门，没另设据点。除一区外三个据点都有一小队鬼子，伪

区部和据点勾结在一起，残害人民。一些特务，警察也猖狂乱动，刺探情报，破坏抗日。有些土豪劣绅，也认贼作父，做了日伪坐探情报员。日伪顽合流，气焰极端嚣张。我党及时组织抗日人民，采取两条战线作战，武装斗争和政治争取相结合，内外线并举，和敌针锋相对。有次陈店子据点敌人，在于希杰带领下向六路口抢掠，被我分区一营打死鬼子八名，伪军十三名，缴获机枪一挺，步枪十二支，煞了敌人气焰。斑鸠店据点被我六支队打了一下，虽没拿下据点，但给敌以震慑，炮楼吊桥白天也不敢放下来了。广粮门据点，我们连续打了两次，第一次我和几个侦察员，冲进鬼子院内，打死鬼子七名后撤出。第二次是我县独立营用土造大炮进行了轰击。抗日人民武装的进击和敌工工作的政治攻势，教育和征服了部分伪军。使其主动向人民靠近，不再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有次广粮门据点敌人去西乡扫荡，通过内线，命令他们不走谭庄，他们就悄

悄的绕着谭庄过去，我驻谭庄的伤病员，安然无恙。

敌人除去武力征服外，也采取了敌特活动。孙青庄有个姓刘的恶霸地主，外号花耳朵，投靠日本当了情报员。有次我抗日部队贾瑞臣部住在他家，他派人给日本人送了信，日本平井派了一中队去偷袭，打死打伤我十一人，若不是我军及时赶到，在外围救援，这支部队就将全军覆灭。

日本鬼子还实行了碉堡政策，铁壁合围，蚕食扫荡，连保清乡，妄图将我抗日部队挤出东阿。我抗日部队在党的领导下，和东阿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坚持和敌斗争。四三年日本纠集各大中小城市敌人，对我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采取快速集中办法，封锁消息，闪电袭击。常常使我部队陷入敌人层层包围之中。伤亡极大。四三年有次鬼子扫荡，连伪军都不知道，我区队被敌包围，追击，岌岌可危。伪大小赵据点小队长刘方池，在关键时刻，将我区队让

进据点，给战士换上伪军装，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混了过去。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岁月，鲁西闹旱灾，庄稼不收，而日寇反而加紧扫荡，到处抢掠，东阿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我们部队每天供应半斤小米还要节约二两给群众吃。靠树叶、野菜充饥，一天只能吃两个半饱。为了人民，上级下命令，采摘树叶时，不准部队采下边的，下边的让给群众，战士年青可爬高采上边的。我当连长时，有次去打冠县一个据点，打了一天一夜，也没吃饭。通讯员转了半天，只找到了三个鸡蛋大的棉籽丸子，虽然饥肠噜噜，也难下咽。没别的办法，打完仗后，带领全连去野外包围草地打野兔子吃。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部队战士没一个叫苦的，对胜利充满信心，军民互相关心，互相体贴，患难相济，生死与共。表现了中华民族高度爱国主义的凝聚力。

### 三、全面反攻，夺取胜利

由于东阿县委，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强敌工工作，到四四年，林立的碉堡逐个拔除。我党从抗日战争伊始，就派来了一二九师骑兵团徐向前、肖华支队，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有次城里日本派出一辆汽车，载着十几个鬼子，二十几个伪军，到姜楼栽电线杆，我骑兵团迅速予以歼击，缴获机枪一挺，小炮一门，步枪二十余支打死敌人十几名，下余的狼狈往聊城逃去。我分区一、二、三团，打进阿城，全歼李洪图中队。我三团夜袭安乐镇，消灭敌人一个大队，歼灭三百余人，缴获步枪三百五十余支。我们连续在阳谷作战后，四四年秋忽然接到内线送出的情报，敌人集中一百余辆大车，向官庄、谭庄一带抢粮，三团和独立支队连夜跑步东返，拂晓，按上级指示到达赵洼，进行埋伏，出其不意的打击敌人，消灭日伪三百余人，击毙鬼子二十余人，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随后又北上打刘旺山，南征攻东阿城。

东阿老城，是日伪大本营，工事坚固，防守严密，城墙厚一米多，全为石灰、砂石凝聚成，高近十米。墙上有重军把守，墙下有好几米宽的护城河，河水颇深。四五年夏季，上级分配攻城任务是：二团攻西城，三团攻东城，一团打增援。三团攻东城确定二营五连从东南门突破。由于敌人火力猛，五连伤亡过大，机枪手全部牺牲，改换四连强攻。我连刚将云梯竖起，被城上敌人推倒城壕里，火力封锁。为争梯子，我伤亡二十多人。于是我们将“东南门突破”，改为“东门爆破”。爆破成功后我带四连直插桥头，切断敌人退路。仅东阿战斗，就消灭敌人三百五十余人。

东阿日伪武装力量，除各区自卫队外，警备队有十五个中队，约两千三百余人。苦山、斑鸠店、鱼山起义八百人，赵洼战斗消灭三百人，房辉华投诚带走一百四十余人，东城战斗消灭三百五十余人。剩下的约七百余，龟缩在西城日本司令部内，不敢出门。日本鬼子投降前夕，刘德

超率领残兵败将，随日本人撤回济南。其带出的人马，编入国民党十二军。至此，东阿全县获得了解放。

## (二) 二次解放东阿城

### 一、分区侦察连的组成

1946年我和梁仁魁团长由热河省被调回冀鲁豫军区，组织决定将我和梁仁魁同志分配到徐州一个起义的部队贺彭举部队工作。我们驻在军区菏泽的一个早晨八点，刚通知我们乘坐汽车出发时，又接到陈毅司令员的电报，叫我们不要去徐州了。电报上说贺彭举又率领原起义部队叛变了。原被派到该起义部队去的同志，都被贺彭举杀害。后来我们又被分配到平阴一分区司令部。一分区后来由平阴移驻东阿县朱旺山村时，军区决定一军分区划为一、六两个军分区，以黄河为界，河东为一分区，河西为六分区。我任六分区侦察股参谋。48年六分区改为冀鲁豫军区独立第

一旅，我任侦察股股长职务。

黄河的水自从花园口决口后，黄河干枯，一直到47年才又有水过来。国民党吴化文的83军乘机顺水而来。重新占领了已被解放的东阿县城及黄河以东。沿河设有岗卡，使我东阿黄河两岸交通断绝。原来东阿早已逃到济南去的刘德超的残余尹得月、张风芝等，纠合了原刘旺山逃到济南的冯太恒一伙，又在东阿成立起东阿保安大队。还有逃往外地的地富分子也乘机回到了东阿。比如大店子的刁丙进、周庄的周庆均，也都到了东阿组织了还乡团，成立了县、区、乡的国民党地方组织，沿河日夜巡防。在那国民党83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我东阿一区由河东移到河西，黄河以东全部被敌人控制。冯太恒的保安队和还乡团，因为尹得月、周庆均等都是东阿河西岸的人，对我河西人地两熟，经常乘机夜袭我根据地农村。比如由旧城偷渡到姜庄杀害了我村干部，又窜到我周庄烧了我们准备

渡河的船厂，抓去了鱼山妇救会长孙秀珍。分区首长朱子伟同志、政委申云浦同志决定为摸清进犯敌人的情况，有力地打击敌人，以分区侦察排为主，抽调各团侦察排组成分区侦察连，我任连长，常期驻防东阿城西河边的曲山子、姜庄一带。以便夜渡黄河侦察及捕捉俘虏。十月份的河水冷的刺骨，偷渡没船只好泅渡，下到水里冻的使人喘不过气来，后来我们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收集了些葫芦，偷渡时每人背上一只葫芦，这增加了水对人的浮力。当地群众见了都称我们侦察连为葫芦兵。

我连曾数次由丁口过河插到东阿城东窑头村、丁泉、大寨、码台山区，打击出城枪粮的保安大队，也曾由位山过河偷袭了东阿城西龙山驻防的保安大队，打死打伤敌人20多人，俘获敌人50多人，缴获长短枪70余支。

## 二、一次血的教训

1947年的11月黄河水势上涨，上级决定各县

要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对敌斗争。我东阿一区干部，需要返回河东一区去。一区区长焦学文同志带领一区区队选择了鱼山北三里处南桥偷渡。十一月的天气，水冷无法泅渡，又找不到船只。因河水干枯多年，原来所有的船全部毁坏。后来还是焦学文同志在南桥村内一个水塘里发现一只过去打鱼的小船，看船的样已是多年没用了。破烂不堪，船缝有一指宽，把小船抬在水里泡了一天，船缝稍缩小了些，但仍向船内流水。又用破棉花把船漏水的缝堵了下，决定用那只破船渡河。小船总共不到一吨的排水量，在大风浪里漂渡确有危险。再说河对岸又有敌人巡逻。经过研究，在大部人员没过之前，首先派区中队一个熟悉河东岸的战士，第一船过去，负责警戒。晚10点开始渡河，第一船的一个班顺利地过去了。第二趟焦学文同志带领区中队40余人全部上了船。我们的任务是掩护区部过河。我上了船仔细地看了下船吃水的情况，我认为小船超过负荷

太大，怕在大风浪中会出问题。我向焦学文同志提出建议，最好下来一半人，分两次过河，不然太危险，焦学文同志认为我的建议是对的。区队长张效霞同志反对。他的理由是对面敌人时常巡逻，时间不能拖长，要求一次过去更为安全。焦学文同志犹豫了。我说：“区长您下来吧，下趟我们一块过去。”焦学文同志就下了船，小船载着40多人摇摇摆摆地开了。焦区长、我和侦察连全体同志两眼紧盯住向河心开去的小船。船到河心天黑风大，逐渐看不清了。忽听到河中心乱喊救命。不好！船出问题了。天黑风急，浪花溅起的水面约二尺高，只听河心乱作一团，大呼救命。我听不清是怎么回事，喊叫声顺水向北，肯定是船沉了。我们也就在岸上顺水向北追去。河东岸的枪响了，一直追到了丁口附近，河内喊声没有了，河东枪声也停止了。不能再渡河了，先过去的一个班知道船失事，他们没再等待，由东阿城南转向城东，目的是进入山区活动。他们走到少岱

山东北的一个村子时，天已东方发白了。他们都是本地人，找到村长隐蔽了起来。但村长叛变了，暗中向东阿城里保安队报了告，一个班被敌人抓了去，全部杀害在少岱山的北山脚下。东阿一区除焦学文同志外，凡参加渡河的同志全部牺牲。

### 三、袭击东龙山

龙山村位于城西鱼山对面黄河，南岸、小清河西岸的三角地区，村东头的小山包不算高，不过200多公尺左右，山东面靠东龙山村，约200余户人家，是个两面靠山，一面靠水的险要之地。自从我东阿一区在南桥渡河失败后，敌人对黄河各渡口更加警惕。鱼山对过的姜沟驻有83军的一个营，防御地区由姜沟至小河口、东丁口村，这是我军山东至冀鲁豫军区的主要交通道路，还有还乡团警戒。这对我们的渡河工作增加了较大的困难。为了摸清敌人的兵力部署，我侦察连在敌人严密的封锁地区，小河口对过的大河口，进行一次偷渡。我们先头班悄悄地从小河口村北登岸

后，立即发现小河口村西，紧靠河滩，有敌人搭的一个小窝棚。副班长龙云生同志安排好了警戒，带着半个班向敌人的窝棚搜索过去。首先观察了敌人的堑壕里，没有发现敌人的岗哨，就把窝棚包围起来。看看窝棚里有不大明亮的灯光，肯定里边驻有敌人。我们的侦察员用枪口对准正在梦中的敌人，将其一个个地推醒，命令他们举手投降，另几个同志早把敌人放在窝棚角里的枪拿在手里，一枪没发俘敌一个加强班20人，缴获步枪17支，经过战地审问，查清了东阿驻有83军一个团部，驻城西姜沟渡口一个连（营部驻小河口村）。城南大吉城村是东阿通往东平的要道，驻83军一个营，并负责监视小清河的渡口。县保安大队，把冯太恒和刘德超逃往济南时的散兵组织起来，约有300多人，编成三个连，大队部带一个连驻东阿城，两个连（即尹得月连、张风芝连）驻东龙山村，负责鱼山至范坡一带河口。为了打击东阿城的外围力量，孤立东阿之敌，分区

一、三团配合三分区七、八团在军区统一指挥下，插到东阿以东尹马庄、大羊、丁家务一带，寻机打击83军或泰安西进的12军一百一十一师。分区命令我侦察连配合主力军行动。要活动在东阿以西，乘机打击沿河一带之敌，牵制83军东援。最好消灭冯太恒保安队这个地头蛇，打瞎敌人的眼睛，以免河西群众遭敌破坏。为不惊动敌人，我连在位山过了河。晚八点插到斑鸠店。经过轻装，将车子马匹全部留在斑鸠店，研究了龙山的地形、打法，决定十点打响。我连接时接近到龙山村南二里多路的柳树林内，经过了解及试行，发现村南接近村庄有困难，主要是黄河汛后水落，泥沙很大，表面上看上去好象地面已干得裂缝，实际走上去烂泥陷到膝盖，拔不出脚来，无法前进。我想，怎么办？向东边小清河堤上去转向龙山？不行，那是龙山出入的主要道口，敌人的警戒一定严密。我临时召集各个排长研究后，仍决定采取偷袭的方法，将队形变化一下，把一

个连改为以排为单位的三个战斗队形。不能走就滚，用滚进的方法。这样前进的目标更小。滚进每个人占的面积大，烂泥陷不下去。房翟礼排长带一排手枪排由龙山西头接近，尽量不使敌人发觉。刘怀先排长带二排步兵排由村当腰袭击敌人。孟广庆带双枪（长短两支枪）排接近村东，卡住小清河堤再向里打，防止敌人逃跑，我们侦察连同志在泥里滚了约两个小时，总算到了村沿能站脚的地方。不好！三排在村东堤上先打响了。二排进村用机枪向东西两面扫去。一排顺着龙山村由西向东打，和二排取得了联系。夜里看不大清，和逃跑之敌人跑到一起去了。听到东堤上三排大喊抓活的之声，敌人转头又向北跑。一排才发觉和自己跑在一起的是敌人，几十支匣枪向正逃跑的敌人扫去。当场打死10余人，活捉27人。被二排追赶的敌人全部跳下了河，三排在河堤上停止了打枪，象在河边赶鸭子一样，只顾从河水里向上拉已被赶到河边的30多名俘虏。尚未

打扫战场，姜沟方向敌人增援来了，我们顺小清河堤撤回到斑鸠店，清查战果俘敌80余人，尹得月、张风芝两个连的兵力已被消灭了大半，天亮了大家一面清点俘虏，一面大笑。因为保安大队的兵大部都是穿着由老百姓家抢来的衣服，还有的穿了一件女人的花裤子。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侦察员从头到脚都是烂泥，如不仔细看，真的都认不出谁是谁来了。清点完俘获人数、物资，将一切交给了地方政府。我们侦察连转向东阿以东丁家务和分区会合，参加了消灭12军一百十一师的战斗。

#### 四、冯太恒弃城而逃

丁家务位于东阿城东南30余里，接近肥城、泰安边界。我分区两个团及三分区两个团驻在大羊、丁家务一带。国民党12军一百一十一师向我一、三团阵地发起了猛攻。我一团团长站在村西南角的一堵破墙后边指挥战斗，三团守在丁家务的东南方向。三分区七八两个团驻大羊村。敌人

来势很猛，战斗一开始我分区驻地丁家务村就被敌人攻进了半个村子，一团和三团一、三营在村内和敌人展开了巷战。三团二营守在丁家务村东南角的一个200米高的小山头上。敌人炮火及飞机炸得丁家务村烟雾弥漫，我们阵地上看不清敌人的战斗组成情况，两个团的伤亡较大，敌人的两架飞机上下轮番扫射。飞机一个俯冲扫射，我们卧在地面上的战士就伤十几个人。分区首长况玉纯司令员见一团伤亡最大，通知我带领侦察连支援一团防守。向王团长传达首长命令，要一团再坚持20分钟，七八团由大羊方向插向敌人右边迂回打击敌人。我带侦察连跑到一团王团长跟前传达了分区首长的命令，并告诉王团长侦察连归一团指挥，王团长看了看我侦察连，又用望远镜看了看我们倒下的战士，指着正在进攻的敌人告诉我：“曹连长，你们连由山崖爬上沟去，从敌侧面打乱敌人的战斗队形，使敌人进攻拖延时间。”我连立即通过山坡悬崖爬上了南山坡直向敌人侧

面冲去。正好敌人两架战斗机，正猖狂地一上一下地向我一团阵地扫射。眼望着敌人两架战斗机一起冲了下来，扫射后上升时两架飞机碰在一起，起了大火。我们的战士见了无一不鼓掌大笑。分区况司令命令一三团立即反冲锋，敌人乱了，见我军冲了上来，拔腿就向东北方向逃跑。我三分区七八团从右边截击了逃跑的敌人。侦察连撤出村后，把逃跑之敌迎头堵着了。侦察连的180多名英雄们，眼红了，当场打死的敌人不算，将被活捉的30多名俘虏偷偷地用刺刀挑死在山沟里，事后首长们批评了我。首长的批评加上牺牲了同志们的仇恨，涌在了我的心里，心情好久不能平静。战后统计一下，除打死外，俘敌团长以下的1800多人，缴获钢炮一门，轻重机枪50余挺，步枪2000余支。一百十一师被重创后，12军缩回到太安，不敢再向东阿附近进犯。为配合分区部队行动，黄河司令部参谋长梁仁魁同志带了一个河防营，袭击了东阿城南大吉城83军一个营的驻地。东阿

外围的敌人到处受到打击，敌人害怕了。83军撤回了兖州，只有冯太恒的保安大队残部及少数还乡团，白天出城抢粮，夜里缩在城里不敢出城活动。

我侦察连有些伤亡，在太西得到了补充，回到了东阿附近活动。有次根据确实的情况得知敌人要去大寨一带抢粮，我们连翻过大寨山正好和冯太恒的保安队相遇，因我们在山上高处早被敌人发现。这时敌人一看到侦察连，拔腿就向东阿城方向逃跑，侦察连边追边打，由于几天越山行军，过于疲劳，终于被冯太恒逃进了城去。敌人士气正是低落的时候，我们不放过打击敌人的机会。估计东阿已被孤立，敌人不敢再守下去。当晚我们住在城东南五里处窑头村，派出班哨在城外扰乱敌人，要把敌人从城里赶出来。在敌人向济南逃跑的必经之道白塔，消灭敌人。拂晓我们进入了伏击阵地，狡猾的敌人利用人、地两熟的条件，顺着黄山西脚直奔小河口方向，往平阴逃走

了。我派了三排骑兵追到王镐店，因为平阴尚有大批敌人，没有再追。除抓到十几名还乡团外，大部分敌人逃往平阴。天亮时，我们开进了东阿城里。东阿县城第二次解放了。我们随着刘邓大军（17军）进入河南，到大别山区，参加渡江战斗。

## 活捉日伪区长王毓恭

王仲范

一九四三年，已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益深入，我华北和全中国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敌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枯竭，已达没法解决的境地，为了维持他侵略战争的继续，大力推行其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战略目的。它残酷的在占领地区通过其伪区、乡政权向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搜刮，破铜烂铁也被征收殆尽。也正是一九四三年东阿县天旱无雨，麦子无收，人民以树叶、草根、树皮充饥，残绝人寰的敌人尚通过他的伪

区、乡政权向人民逼收每亩地八斤八两半麦子。粮食是宝中之宝，天旱不雨，地无粮收，向何处去弄。伪区、乡长逼得老百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哀鸿遍野，惨不忍睹。在这种情势下，反对“八斤八两半”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我敌后区委随即召开会议，研究决定：（一）号召群众顶住，誓死不交粮；（二）争取伪区、乡人员，对敌人阳奉阴违，千方百计应付敌人，不向群众逼粮。区委的这个决定，区政府均坚决做到贯彻执行。为了使此任务迅速收效，作为区长，我曾亲笔写给伪区长信数封，要他以我区的人民生命为重，免逼老百姓交纳不出的麦子，并嘱他为了应付敌人，望他选择据点外的村庄见面，共同商讨办法，关于他的安全问题，抗日区政府绝对保证。但遗憾的是，信如石沉大海，永无回声。记得是七月下旬或八月初旬，这个奸猾透顶的王毓恭，却叫伪人员通一口信给我，要我到陈店子据点内和他谈判，他负责“安全”。但并非诚意，实

则是拒绝不谈，既然如此，也不能强求。

阴历八月初九，我在朱旺山见到陈店子据点内的伪人员，我告诉他们，你们可给伪区长王毓恭捎个口信，邀他和抗日政府共商应付日本鬼子的大计，不要强逼人民交八斤八两半麦子，这是叫他给人民办桩好事，将来人民会原谅他，既然他自绝于人民，拒绝不谈那就算了。还应告诉王毓恭，我们是抗日区政府，以保护人民的生命利益为宗旨，对王毓恭这样死心塌地的汉奸，不能坐视不问，一月内在战场上活捉他，叫他预备预备。区政府光明正大，不做暗事，说话算数，说到哪里做到哪里，走着瞧吧。

之后，却有人批评我，说我口气太硬，话说得太死。我说我们能看着我们的锦绣河山被日寇占领灭亡？能使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做亡国奴么？绝对不能做的。不能兑现，敌人说我们光吹。我们抗日人员，对敌人说话决不能表示哀求，心慈手软。要他们放下武器滚回老家，是无济

于事，也是个巨大的原则和立场问题。至于哪天捉到王毓恭，当然我们不能打保票，但在思想行动上要作活捉他的充分准备，遇到机会就干，绝不放过。王毓恭认为区政府软弱可欺，想错了，他不知道已换了人间。同志们是坚定了信心的，我们一定活捉王毓恭。区委书记杨森同志，自作战以来，对敌我任何问题，分析得精细果断。

阴历八月十六日拂晓，我同区委书记杨森同志，率区队住在堤外侯庄。为了隐蔽目标皆设暗哨，任务是和陈店子据点内的“剿共”队长肖冠英接头联系。通过接头，了解敌人的情况，特别是要了解有关要粮食的情况，以便更好的研究对策。早饭后，暗哨报告，公路上有队伪军，武装整齐，从北向南。区队在院内整队待命，准备战斗。我说还不知道是哪一部分伪军，可以不打，交了枪也要还给他们，但千万别暴露目标，大家先都回屋休息，咱还有别的任务。我和杨森同志出去看了看。我们上了大堤，见南去的伪军进入

有炮楼的凌山村内。噢！原来是任玉青的人。转身北望，金秋景色现入眼帘，大秋作物有的已熟，有的即将成熟，顿时轻松愉快。杨森同志说，王毓恭来该有多好！我说，若王毓恭今天来，付出代价也要活捉这个王八蛋。在我们返回侯庄的路上，村头一家店家正做焦枣，香味扑鼻，进去看看，我还未见过做枣的呢。进门后刚坐下，通讯员急来报告说：“正北发现敌人，杨连长问打不打？”“哪一部分？多少人？”未答。我说：“通知部队立即作好战斗准备！”我们正要回部队，通讯员又来紧急报告说：“敌人有六、七十已接近村庄，连长问打不打？”我还未及答复，两班战士和区政府、区委的通讯员已持枪出来排队了，我随即嘱咐通讯员，命令连长叫他打突围，我在正面打，指挥队伍从南向西运动，封锁公路口，尽量隐蔽，待敌人到大堤时再打，尽量捉活的。其余人员留在这里当预备队，我和杨森同志、通讯员进入防汛的一间没顶的破

房内作指挥所。敌人的前哨是两个骑自行车的，刚到大堤上就被我们的战士活捉了，其余敌人回头向北跑。我们的战士边追边喊交枪不杀，但不起作用。我组织人员，射击敌人，追击的战士也开枪了，命令通讯员向公路冲。一阵激战后，我们俘敌九人，缴获步枪七支，自行车两辆，大车一辆，麦子200斤。问俘虏，你们是哪一部分？答：

“自卫团”。“你们的区长来了没有？”“向北跑了”。我即命令一个排长带队紧追，定要把这个汉奸王毓恭活捉回来，排长率队刚要出村，王毓恭已被杨连长捉住送来了。我很高兴，大家兴高采烈！由于这里南距凌山炮楼二里，北距陈店子据点四里，地形使得我们不能久停，我们便整队立即转移到三区，把汉奸区长送往县政府处理。县政府判处汉奸区长王毓恭死刑，一个星期发还四区执行。

枪决王毓恭时，我嘱咐通讯员杨成林同志，快到刑场告诉王毓恭：“今天你要服法了，还有

什么话说么”。枪决王毓恭后，在东阿县伪人员中震动很大。我们是中国人，决不能当日寇的伪人员。反对八斤八两半麦子的斗争就这样胜利的结束了。

这就是祸害一方，认贼作父无恶不作的汉奸王毓恭的下场！

## 智擒郎笑山

齐 禹

郎笑山，又名郎继思，绰号“狼撕鸡”，东阿县铜城南八里堂子人，系国民党员，中统特务。

一九四〇年曾一度混入我东阿抗日县政府任秘书。不久即逃往土顽三支队，后又到在平县境内的刘旺山三支队据点。

据点内住着顽匪一个团的兵力，约有千余人。团长冯太恒，阿东一区高集人。副团长路兆

平，在平县广平路庄人。解放后从外地将二匪捕回处决。一营长张洪举，阿东一区石佛屯人，解放后病死在狱中。二营长宗道松，阿东一区宗庄人；三营长刘昌烈，阿东一区刘集人，一九四五年日降后被我军捉获处决。

另外，还住着一个顽匪专员公署和几个县府。专员何向阳，平阴县人；东阿县长王子敬，东阿县铜城人；平阴县长赵家泗，平阴县龙桥人。郎笑山在专署任特派员。

一九四二年夏季，正是抗日形势逐渐恶化，日寇推行五次“强化治安”，搞“政治诱降”阴谋活动的时候。顽匪专署秉承其日寇主子的旨意，派郎笑山来铜城一带，对我抗日不坚定的人员进行策反活动。

我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报告了分区司令部，司令部指示要想尽千方百计把他捉住。因为铜城以南归东阿四区管辖，阿东一区进行工作不太方便，我们采取了轰兔子的办法。一方面利用

工作关系在八里堂子一带撒风说：郎笑山从北围子（刘旺山据点）回来几天啦，要捉活的，跑不了他；另一方面我带着两个战士隐蔽在杨柳的路上堵截，张网等候瘸腿兔。这个地带属于敌伪顽势力较强的范围，我们的人很少公开到那里活动，他们认为还是比较安全的，是往返必经之路。

我们设伏的等三天黄昏，郎笑山从南边踉踉跄跄的走来。一九四〇年夏季，在东阿抗日县府我虽见过郎笑山一面，但是时间长了，又是黄昏，很难确认。我们就冒充刘旺山据点的小股武装盘问他。郎笑山说：“我叫杨登山，是枣棵杨庄的，家中有病人去杨柳请医生”。我们硬说他是八路军的探子，不放他走。有个同志故意威胁说，少给他啰嗦干脆把他干掉了算啦，别耽搁我们赶路。当郎笑山以为我们真是三支队的人，不讲实话有性命危险的时候，才吐出了真实姓名：“我叫郎笑山，我们是一家人，我是刘旺山专员公署的，怕遇上八路才改换了姓名。”

我们说：“你完全是胡说八道，驴唇不对马嘴，前言不达后语。你开始说叫杨登山，后又说叫郎笑山，现在又冒充是刘旺山的。不大一会从你的狗嘴里冒出三股子山来，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欺骗谁呀！不信你这一套。”一个同志说：

“我们到黄河南路子很远，天亮前还得赶回来，把他干掉了算啦。”我们这样一说，真把他吓坏了，他急着说：“我真叫郎笑山，不信的话我有证明。”哆哆嗦嗦的从鞋里掏出通行证。我说：

“好，人证俱获，总算完成了任务。”

当夜我们把郎笑山送到住河西县黄楼的分区司令部，军分区把他们送到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又转给冀鲁豫行署公安局，经过审讯，供出特务线索和阴谋活动的罪行后处决。

## 枣 棵 杨 惨 案 始 末

朱成震 曹代岭

一九四五年春，抗日战争进入第八个年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在望。日本军国主义者已如陷泥沼，如步深渊。人力、物力消耗殆尽。太平洋战争的失利，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空前壮大，使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人力、物力更感贫乏。他们为挽救其不可避免的失败命运，困兽犹斗，加紧了对我抗日武装的扫荡和对我国资源和人力的掠夺，妄图以此弥补其人力物力的不足。

一九四五年，黄河西岸，日、伪据点，大部已被拔除，运东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驻山东的日本侵略军为了破坏我抗日根据地，抢掠根据地的人力财力，于是年初，纠集济南、泰安、莱芜、新泰的日军四千余人，伪军六七千人，渡过黄河对包括我运东根据地在内的鲁西抗日根据地进行

疯狂的扫荡和抢掠。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日（农历正月初八），日军扫荡到达枣棵杨一带，残无人道地制造了“枣棵杨惨案”。

枣棵杨庄，原属茌平三区（现属东阿杨柳乡）。当时有一百余户，五百余人。在这次惨案中，我村民和民兵被杀和牺牲的有三十一人，伤二十八人，抓走青壮年二十八人，其中有十八人被抓到日本国当劳工，烧毁房屋120余间，全村柴草全部烧光（约六十万斤）。烧毁树木无数。

枣棵杨村地处赵牛河东岸，茌（平）、东（阿）界首，抗日战争时期属运东根据地，是有名的堡垒村。那时日、伪、顽三方勾结。碉堡、据点林立，距最近的据点仅有三里。敌人经常出发扫荡，杀人放火，逼粮逼款。该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联防，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全村有二十五名联防队员组成的钢枪班，他们集体吃住，日夜轮流值班监视敌人，遇有情况立

即通知全村作好战斗准备。还有二百多人的自卫队，以邻近分片，组成二十多个战斗小组。每个小组有土炮一门。土枪数支。还有大刀、红缨枪。青年妇女也组织起来平时轧制黑色火药，砸破铁以备铁砂不足时供给土枪、土炮使用。战时运送支前。敌人来了，各小组立即进入各自的更屋（修在房顶上供监视敌人并作战斗时隐蔽之用的小屋）。钢枪班则作为机动力量随时支援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因此小股敌人从未能进入这个村子。这里成为运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门户之一，它象钉子一样牢牢的扎在敌人的眼中。敌人经常到这里骚扰，伺机妄图拔掉这颗钉子。

在长期的残酷斗争中。这里的群众锻炼得勇敢顽强，不怕牺牲，机智勇敢的和敌人进行斗争。

四三年春，一天的早饭后。村民常维汉端着仅存的一点玉米去街上轧糊糊。刚倒在碾子上没推几遭，伪乡政权的贾瘸子带着一个乡丁来杨

庄催粮。恰巧看见常维汉推碾。便说：“有粮不交，说没有，这是什么！给他拿着”。说完便走上前要抢。维汉一看肺都气炸了。二话没说，抽出推碾的棍子，抡起来向敌人打去。贾瘸子一看势头不好，顾不的抢粮拉了一下乡丁，拔起瘸腿一颠一颠的往村外跑去。

枣棵杨枣树多。枣芽刚冒出来后，有虫子，要用棍子猛敲树枝，把虫子震下来。有天早晨，杨玉册和父亲去村西打枣虫子。玉册刚爬上树去，打了没几下，发现从河西过来一个人，鬼鬼祟祟向村边走来。仔细一看是个伪军。看样子不是来侦探情况便是企图乘我不备抓个人，好逼粮逼款。玉册看准敌人越来越近，一下子从树上跳下来。大喝一声：“狗日的，哪里去！”抡起杠子向敌人扑去。他父亲也随后跟上。敌人愣了一下，一看风头不顺，一溜烟跑回了河西据点。枣棵杨村的群众就有这么一股天不怕的劲头。

四五年古历正月初七傍晚，我军分区三团驻

进这一带村庄，杨庄驻了一个连。我军为避免与敌人正面作战，于初八黎明前撤走，而敌人尾随而至。

黎明，启明星还在眨着眼睛，溜溜的小北风吹在村西北角房顶上值班钢枪队员刘安芝的脸上，钻进衣缝，使他裹了一下身上的棉袄，瞪大了有点疲乏的眼睛，警惕的向村外望去。忽然发现干涸的赵牛河里有什么在蠕动。他伸长脖颈，往前探着身子，目不转睛的盯着。啊，敌人！他顺手拿起木梆敲了起来，梆、梆……警报立即传遍全村。自卫队长杨立秀立即带领钢枪班检查各小组进入战斗岗位情况。并告戒他们，土枪、土炮射程近，一定等敌人临近再打。又组织老弱妇孺到地洞或夹皮墙中隐藏起来。一再叮嘱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要随便出来。

天亮了，大约有五、六百日军顺赵牛河从北向南运动，他们爬上河沿四面散开悄悄向村子围来，村中没有一点动静。敌人摸不清情况，不敢

冒然进攻。首先向村中打了一梭子弹，但村中仍然死一样寂静。

敌人越来越近了，一声号令，一批手榴弹呼啸着飞向敌人，轰轰的炸开了。土枪、土炮也怒吼起来，象阵阵飓风挟着铁砂，带着仇恨，拖着一溜青烟向敌人蒙头盖脸的刮去。敌人一下子停止前进，缩在地上开始还击。步枪、机枪，子弹似冰雹一般向村中撒下来，打在土墙上，爆起一片片黄色的烟尘。小钢炮射出的炸弹呼啸着落进村中的街头、房顶，腾起一股股烟柱。有的房顶塌陷了，冒烟了，着火了。

战斗首先从村西北角开始，接着四周都响起了枪声，敌人包围了整个村子。

村西南角杨西莲战斗小组打得十分激烈。参加战斗的八九个人，其中光杨西莲一家就有父亲玉录、叔父玉元，哥哥西荣四个人。玉元一下子解开衣扣露出紫红的胸膛。眼睛红红的冒着火，一边向敌人叫骂着，一边向敌人还击。战斗中，

一颗罪恶的子弹穿进了他的胸膛。当即牺牲了。西莲一看叔叔牺牲了，象疯了一样不顾一切向敌人射击。身上的棉袍被打了五、六个洞，冒着青烟，他睬也不睬，也顾不得。玉林负伤了，被强扶下房。但他趁别人不注意，又爬上房去继续参加战斗，直到最后一口气。不久，玉敏也牺牲了。玉录从房上掉下去摔伤了腿，但他们仍然顽强的抵抗着。

战斗在南门上的小组形势特别险恶，在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中杨玉奎、杨玉珠先后牺牲了，杨玉银也负了重伤，杨西角的双腿被弹片炸得象狗撕的一样血肉模糊，杨玉芝的嘴崩进了一块弹片，但仍一边高骂着敌人，一边愤怒的还击，直至壮烈牺牲。只有八、九岁的杨绪亮和伤了腰的父亲西田也跑出屋来往房上递火药、铁砂。他爷爷玉兰六十多岁，双目失明，他看自己帮不上忙，便站在院子里一遍遍的高喊：“老少爷们，都上房，坚决顶住，拚死也不能让敌人进来！”

借以鼓励大家的勇敢战斗。

战斗在继续进行。钢枪班队员杨希才来到西南角支援战斗。西才是个有名的猎手，许多凶恶狡猾的野兽在他枪口下丧生，人称“神枪手”。这时他发现一个拿小旗的日军正在上下左右的挥动手中的小旗，他伏下身只一枪就把敌人打趴了旦。紧接着又把敌人的一名机枪手击毙，另一名敌人想爬过去援救，结果也被打伤。这下敌人气疯了，机枪、步枪、小炮各种子弹一齐向这里倾泻下来，但是西才已经转移了阵地，连半根毫毛也没损伤。

班长杨玉田的爱人张玉莲快要生孩子了，别人劝她隐蔽起来休息，但她执意要和丈夫一起参加战斗，一步也不离开。她送火药、运锅铁、递砖头……一刻也不休息。苍白的脸上挤满了汗珠，肚子一阵阵疼痛，咬紧牙关，一声不响的忍受着坚持到底，当天晚上就生下了女儿小苓。可是玉田却没能见到自己可爱的女儿，因为上午带

头突围的时候牺牲了。

杨立兴战斗在南门上，当他看到西南角那个小组伤亡大，火力逐渐弱下来，处在危急之中，便立即前去支援。但还没迂迴过去，就负伤栽倒了。杨立恒一看急忙跑去救护，一颗飞弹打穿了他的嘴巴，血流如注。他不顾自己的安危，仍然跑过去，抱起立兴一看已经停止了呼吸。

战斗持续了四个多小时了。一个以土枪、土炮、手榴弹为主要武器，人口不满六百的小村子，面对人数众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强大敌人，不惊慌、不屈服，顽强抵抗，不怕流血牺牲。这是一场多么艰难的战斗，又是多么难能可贵精神啊！这正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铁砂没有了用锅铁，锅铁没有了用砖头，火药没有了……。土枪、土炮、手榴弹的响声逐渐稀疏下来。

上午十点多钟敌人爬上了围墙。自卫队长杨立秀深感无法再坚持下去，便决定带领队员与部

分群众冲出村去。他们先到北门，一看敌人兵力很强，便又转回南门。张立方想从水沟中偷偷爬出去，结果中弹倒下。他们打开南门，杨玉泗带头一下子冲出去，结果一阵机枪扫来，身中数弹当场牺牲。立秀一看不行，想立即关门退回去，但是已经晚了，敌人随后跟着冲了进来。没有子弹的钢枪只能算一根棍子。他们丧失了抵抗力，只好撤入关帝庙内，把没有子弹的枪支藏好，大家分散隐蔽起来。

敌人冲进村子，到处搜捕、杀人、放火。柴草垛被点燃，房子被烧着，到处是一堆堆大火，几丈高的火舌舔着周围的一切。树木烧焦了，弹孔累累的土墙烤红了，随着房架被烧塌的轰响，烟尘滚滚，如浓重的黑云笼罩着整个村子的上空，燃过的灰烬被风卷起，撒向四方。

一名日军从房上跳进院子。端着上了刺刀的大盖枪闯进了杨张氏的屋里，五十多岁的杨张氏用身体挡住躲在她身后二十三岁的杨王氏。敌人

一看只有两个妇女便瞪着眼咧着嘴唔哩哇啦的逼过去，杨张氏一面护着身后的杨王氏一手想摸起旁边的菜刀和敌人拚命，她的手还没举起来，凶恶的敌人已经将刺刀扎进她的胸膛，杨张氏一下子倒在血泊里。接着反手又向杨王氏的腹部刺去，肠子被挑了出来。

杨瑞常老人耳聋眼花，敌人用枪逼住他问，八路军哪里去了。老人以为是问他多大年纪，便抬起手张开姆指和食指比了个“八”字说：“今年八十了”。敌人便不分青红皂白。用刺刀向老人连砸带攘，老人当场昏了过去，几天后便含恨而死。

这天有二百多和杨庄有亲戚关系的外村人，来杨庄躲避敌人扫荡，赶上了这次事件。他们和杨庄的群众并肩战斗。有的牺牲，有的负伤，也有的被抓了。马庄的马玉祥被敌抓住。因说自己不是杨庄人，就被敌人捅了七、八刀。

敌人对每一个杨庄人都不放过。杨玉银在战

斗中身负重伤，敌人发现后把他扔在火里活活烧死。杨玉生手无寸铁被敌人追赶跳入水井，敌人仍不甘休，向井中又打枪又扔石头，致使浑身是伤。敌人走后才被救出。

敌人到处乱蹿，走到那里把灾难带到那里。刘维让的妻子尉氏和十几个人一起躲在夹皮墙内，怀里抱着刚满周岁的孩子桂苓，被枪声和敌人的吼叫声吓得忽然哭起来，尉氏怕被敌人听见暴露目标。便一把捂住孩子的嘴孩子被闷得喘不过气来。小脸由红变青、变紫，眼看着快憋死了。尉氏含着眼泪不松手，在众人的劝说下才把手拿开。接着又把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紧紧接着不让孩子出声，直到敌人离去。

战斗中负伤的杨立恒被母亲守护着。他看着街上的浓烟大火，听着乡亲们的哭声，肺都气炸了，他顺手抓起一把镢头往外就走，要去和敌人拚命，说砍死一个够本，砍死俩赚一个。母亲死死的拉住一再劝说，只好含泪忍下。

敌人最后包围了关帝庙，端着机枪冲了进去，到处搜查。躲在秫秸垛内的杨玉册被敌人一刺刀刺透了左脚，将他拉出捆绑起来。当场被抓的还有二十七名青壮年群众，最小的只有十七岁。

十点左右敌人带着被抓的人撤到东南七里之外的解、白、刘村一带，午后我在平县长许效参带人前来营救，组织群众转移到教场铺，大白庄一带，以免敌人再来报复。原来上午我军分区部队，在平县大队，王集钢枪班从西北、西南两面对敌人进行了袭击，敌人怕吃亏提前撤走。下午四点多钟敌人又回到杨庄进行报复。但是群众已经转移，敌人只好又烧了一些房子才往东撤至二十里外的纪庄一带。

晚上六点多钟，军分区司令员刘致远和县长许效参带领部队以及王集一带的群众前来扑灭了大火，慰问了群众，并把伤员送至军区医院治疗。后来对在战斗中牺牲的都追认为烈士，每人发抚恤粮六百四十斤小米。

被抓走的二十八人（有外村的五人），一路上被拳打脚踢枪筒捣，受尽凌辱与折磨。敌人因看着刘维海长得魁伟，便向他背上捅了一刀。还无原无故的将杨西玲的帽子挑掉，头也被挑破。

在芦庄，敌人把抓去的人集合到一个小院里，用机枪堵住门，查问谁是八路军，谁是干部。自卫队长杨立秀怕大家受害，勇敢的站出来说：“我是村长，有事找我，与他们无关”。敌人二话没说就向他的脖子扎了一刀，接着又向他肋下捅去。这位英勇的自卫队长因伤势严重，既得不到治疗也吃不饱肚子，不久便怀着一腔仇恨，死在平阴牢房里。

敌人从各地抓的人越来越多，象对待牲畜一样驱赶着向大城市集中。从平阴押到肥城，在泰安集中装进闷罐车厢运往济南。在这里只一个大库房中就关着两千多从各地抓来的劳工，敌人先把年老体弱的挑出来押往枣庄煤矿。然后将年青力壮的押往青岛，由青岛用船送往日本。这批劳

工中，除从山东各地抓来的外，还有河南、河北等省的人，其中有杨庄的十五人。

他们这批劳工大约有两千多人一起上船，有日军军舰护航。他们象货物一样被关进底舱挤在一起。每人每天一两粮，四个人才能分到一小碗米饭。海上风大浪高，许多人受不了，整天呕吐，连胆汁都吐了出来。十七天的航行，病饿而死达六百多人，全被扒下衣服扔进大海。许多人还活着就被扔了进去。

船在日本下关靠岸，上岸后被分别押往北海道和丘田两地。

在日本，他们受尽各种非人的待迂。活又脏又累，劳动时间又长。日本监管人员稍不如意便呵斥、辱骂、毒打劳工。还克扣劳工的口粮。在这残酷的折磨中有的病死，有的饿死，还有许多人被活活打死。一条人命还不如一头牲畜值钱。从阳历三月至同年八月日本战败投降，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送去丘田的一千多人，仅剩下三、四百人回到祖国。

附件一：

## 一九四五年枣棵杨惨案中被抓去日本当劳工的刘安智同志对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控诉

刘安智：中共党员、原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六十八岁。

一九四五年农历正月初八日拂晓，一阵刺耳的枪声划破天空，惊醒了熟睡未醒的村民，大批日军、伪军突然包围了我们的村子。在抗日战争中不断成长壮大起来的我村抗日自卫队，在队长杨立秀同志的指挥下，率领村民当即对日伪的进攻进行了顽强抵抗。

上午十点左右，我村民兵和群众对二千多日伪军的进攻进行了五、六个小时的奋勇抵抗后，弹药用尽，但是在钢炮、机枪掩护下的日军和伪军，仍在疯狂的向我发动进攻。自卫队长杨立秀同志感到弹药已尽，难以继续坚守，便打算带领群众从北门冲出敌人的包围。来到北门，只见外

边黄鸦鸦的一片，全是敌人，遂又决定从南门突围。打开南门后，钢枪班班长杨玉泗率先冲出，出门不久，玉泗同志即被迎头压过来的日军的密集枪弹所打倒，玉泗同志当场牺牲。我们见日军来势凶猛，便返回围子内，不料敌人也尾随我们冲进村内。我们又撤进关帝庙内，不长时间敌人攻进关帝庙。

村子被敌攻破了。

日军攻进村后，一面沿街放火，一面狂捕滥杀，杨瑞常老人当时年已八十岁，敌人向他追问八路的去向，老人没听清敌人的问话，以为是问他的年纪，便用手比划了个八字（意即八十多岁了），敌人一见，二话没说，即将老人刀刺枪砸，他当即倒在血泊中，几天后，含冤恨死去；杨玉册藏在庙内的秫秸垛中，也被敌将脚刺穿；五十多岁的杨张氏和杨王氏两人藏在一所院子里，几个日军从房上跳进院内，将杨张氏挑死后，又向杨王氏的腹部刺了一刀，肠子当即露了

出来；民兵队长杨立秀被日军抓住后，眼见敌人的暴行，怒火胸中烧，愤怒地对敌人说：“我是村长，有事对着我来，和他们无关！”一个日军士兵见立秀同志出言不逊，便用刺刀向他捅去，一刀刺中了他的脖子，一刀刺在他的肋下，立秀身上血流如注，痛不可忍，尽管如此，敌人仍将他绳捆索绑，押到平阴，不久死在狱中。

日军进村后，大肆烧杀、抢掠、抓人，这天我村有二十三名青壮年被抓。

我们二十三人被他们逮住以后，于下午一点被带到刘庄，路上对我们随意进行打骂，不是拳打脚踢就是用枪托子砸，一个日军士兵无缘无故地向正在走着的杨西玲肩上刺了一刀，幸亏西玲低头快，没有刺在头上，但把他戴的帽子穿了个洞。

到刘庄后，敌人挨门挨户逮鸡捉鸭子放在火上烤着吃，整个刘庄鸡飞狗跳，村民不得安宁。他们把刘庄糟踏了一通之后，似乎感到对我们枣

裸杨庄的恶气未出，便又带着我们返回了我们村上。想再次血洗我们庄。这时我们无不为我们村中父老担心。幸好，当敌人再次来到村上时，他们看到的只是冒着滚滚浓烟烈火的房子、柴垛……。村中老少都已转移了。敌人的兽性无处发泄，便又拿着我们的房屋出气，将那已为数不多的，尚未着火的房子又放了一把火，时至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原西门里，用锨一挖，当时敌人焚烧村子时的灰迹依然可见。

他们在我村烧了一通之后，又跑到大窑进行烧杀。晚上，他们在纪庄住下后，将我们和从柳庄、吴海子等村抓来的二十多人关在一家北屋的西间里。外间的日军将桌椅砸烂，当柴取暖，屋内被他们弄的一踏糊涂。

凛冽的北风，透过门窗和墙缝吹进屋来，象一支利箭射在我们的身上，浑身针扎似的难受，大家紧紧地偎依在一起，相互暖一暖冰冷的身子。我们四十几个人，大都一整天未吃东西，特

别是我们二十几个，从天明起奔波战斗了一天，又身受大半天的折磨，疲劳、饥饿伤疼，对村上亲人的挂念与担心，一齐向我们袭来，身心都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

第二天（初九日），敌人将我们用绳子捆上，四十多人连在一起，在他们的押解下，傍晚来到了平阴，并被关进了监狱。牢房内，高高的墙上有个扎八见方的窗口，微弱的月光，透过窗口射进屋内光秃秃的石板炕上，肮脏的墙壁上布满了一块块乌黑的血迹。两天来，我们滴水未进，特别是立秀同志，身上多处负伤，路上几次受到敌人的毒打，这时已被折磨的不象样子了。杨玉章饿的实在受不住了，求他们给点水喝。一个伪军却说：“这里一不种高粱，二不种谷子，哪来的吃喝！”后经我们大伙一起哀求，并答应家中来人后付钱给他们，一个狱卒才赊给一罐水。

后来，家中去人，经上下打点，才同意家里

在外边买干粮送进狱中。买进来的干粮要先给他们一部分，名曰“抽头”。

在平阴狱中，杨立秀同志的伤势不断恶化，日伪不但不给治疗，反而在精神上肉体上加以折磨，冻饿疾病交加，十几天后便死在狱中。这期间，马庄的马全泽、马全海；我们村的杨西玲、杨玉告、杨立臣家里托人花钱赎回。

一个月后，敌人将我们由平阴经肥城解往泰安（途中、崔德绍、李常兰两人先后寻机跑脱）。到泰安的当天，把我们装进闷罐车，拉往济南。关在一所仓库改成的监狱里。和我们关在一起的还有从其他地方抓来的两千多人。在这里，敌人看守的很严，四周是高高的院墙，全副武装的敌人日夜监视着。

十几天后，敌人突然叫我们在院子里站队，我感到十分奇怪。心想：十几天来我们被关在屋内，吃喝、拉、睡全在里边，从不让我们出屋，今天是想搞什么名堂！正寻思间，只见几个日本

人向我们走来，其中一个日本人一手提着一桶油漆，一手拿着一把刷子。这伙人来到我们队前，从头挨个看起，每当看到年纪比较大或身体弱的人，领头的日本人用手一指，手拿刷子的敌人便用沾满红油漆的刷子往这人的鼻子上一抹……。最后敌人将被刷成红鼻子的人拉出，另站一队带走了。我们村上的杨立化、徐广田也在其中。后来听说这些人被带到枣庄煤矿为他们挖煤。

又住了十几天，一天的早晨，天还未明，我就听别人不住议论，说是敌人要将我们解到别处去。有的人表示不能在他们手里等死，要想法逃出去……。

开早饭的时候，送饭的敌人刚把门打开一半，早就等待着的人们，一起涌向门口，争相往外冲。由于人多，门仅开了一半，人们一下子挤在了门口。敌人一见，便用刺刀向人们乱捅乱砍，并向冲到院子里的人开枪射击，我们也顺手拿起砖头瓦块向他砸去。由于敌人的镇压，我们

又没有组织好，当场被敌人打死打伤的不少，仅有少数人得以跑出，这次暴动失败了。

出事的当天，敌人将我们押上火车，上车前，为防止我们再次闹事，解下我们的腰带把我们捆上，大家只好用手提着裤子。在从济南往青岛去的火车上，不少人利用夜暗跳车逃跑，有的当即摔死，和我们在一块的化胜、刘忠芝也乘黑天跳了车，忠芝当场摔晕，后被好心的老大娘救起，月余后才回家。

在青岛，住了半月左右，敌人给我们发了劳工证，换了劳工服，这时才知道要把我们弄到日本去当劳工。又住了十几天的样子，敌人将我们押上一艘日本火轮。

现在常听人们称赞青岛的美丽，说是崂山脚下的青岛海滨，风景如画，景色迷人，是人们疗养休息、度假游览的地方。可在当时，我们却没心思观赏那里的景色。当我们被人象赶牲口似的赶上轮船的时候，眼前一个个凶神恶煞如狼似虎

的日军士兵，一艘艘耀武扬威，横冲直撞的日本军舰，面对生死未卜，遥无归期的异国之行，无不面带愁容。天水茫茫，海浪滔滔，此去到何处？何处是归程！抛尸异国，暴骨他乡的忧虑，与故国亲人永远别离的心情，象一块块沉重的石板压在我们的心头。

上船后，我们被安置在船的最底层，二千多名劳工挤在装满矿石的货舱里，进了货舱无疑等于进了地狱。舱内浑浊的空气令人窒息。二千多人的汗腥气，大小便的恶臭气使人作呕。特别是当船航行了一段以后，大部分人开始晕船，胸中的五脏象外边的海浪一样不住翻滚，心肝肺一下子涌到喉头。人们开始不停的呕吐，开始还有东西可往外吐，后来胃里的东西吐光了，心里还是不住地翻腾，只好爬在那里张着咀巴干呕，有的把胆汁也吐出来了。

在船上，他们每天给吃两次东西，每次四个人才给只盛二两米饭的一小黑碗饭。几天后，我

们个个饿的面黄肌瘦。有的饿死了，有的饿的实在不能忍受，不愿再活受罪，便爬到上边，滚进海里，自杀了。不少人得了病，狠心的日本人不但给治疗，反而借口传染，把人拖到上边，扒光身上的衣服，扔进大海。每天被他们扔进海里的不下几十人，我亲眼见到好几个人被他们弄上去，没有一个回来的，全被他们扔进了海里。就这样，我们上船时两千多劳工，十七天后下船时仅剩下一千五六百人，被他们扔到海里的足有六七百人。

我们十五人，幸亏在青岛上船之前买了一大串咸菜，靠它我们几个才度过了难关，得以活命。

十七天后，终于结束了海上的苦难生活，在日本下关靠岸。上岸后，敌人将我们重新编队，除杨西荣外，我们几个都被编在一个队里。我们这些人从下关起，又经过七天的行程，到达北海道，一个月后将我们解到一个叫吉村别的地方，

为他们开山抬石头。他们象使牲口一样使我们，稍有怠慢，不是拳打就是脚踢，每天两顿饭，每次只给牛眼大的两个橡子面窝窝头，连半饱也不到。人们饿的几乎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有的走着走着一头栽到地上，就再也起不来了。尽管如此，他们还逼着我们每天为他们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到吉村别不久，我村张殿玉就因挨打、饥饿而病死。

在吉村别和我们一起当劳工的，除山东的外，还有上海、山西、河南甚至朝鲜人。这期间，有的不堪忍受他们的凌辱和折磨，便想法逃跑。日本人为了防止我们逃跑，除严加看守外（每十个劳工便有一名看守），凡逃跑被他们抓回的人，都当着全队劳工的面，乱棍打死，借以威吓我们。当时的情景之惨，令人目不忍睹。

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投降后，方才有所好转。

日本投降后，经中国政府与日本交涉，我们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回到了家乡。

## 附件二

### 杨西荣同志对日军暴行的控诉

在下关上岸，重新编队时，我和安智他们分开了，和另外的一千多人编在一起。三天后，到了秋田，在一个场子为他们抬石头。

在秋田，吃的也是橡子面窝窝头，每天两顿加在一起也不过半斤，就连这一点可怜的口粮，黑心的日本看守人员还克扣我们的，偷偷卖掉，将钱私分。

繁重的体力劳动，饥饿的折磨，使不少人病倒了。他们不但不给治疗，反而硬逼着去为他们干活，实在起不来的，就将他们抬到一间小屋里，不给吃不给喝，活活将人饿死。凡是被弄到小屋子里去的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

三个月后，我们感到吃到口的东西越来越少，同时发现了他们倒卖口粮的行为，大家十分

气愤，便选出代表给他们交涉。抗议他们偷卖我们口粮的行为。但是，亡国奴的生命不值钱，亡国奴的话就更不算么了。他们不但不理睬我们的抗议，反而克扣得更狠，我们吃到口的东西更少了。被饿死的人不断增加，每天都不下六七个饿死的。有句俗语，叫做狼恶虎恶不如饿恶，我们心中的气再也压不住了，与其饿死，倒不如拚着性命和他们一拚。在一个河南劳工的鼓动和带领下，我们造反了！经过初步准备，一个个愤怒地劳工，手拿铁铤木棒向他们冲去。当场打死了几个最凶恶的日本看守，然后分头逃跑。由于我们语言不通，道路不熟，他们又调来了大批军队，结果，我们没有跑出秋田，被他们围困在一座山头上，一个个先后被他们抓住，绑上，挨个进行毒打，当场不少同胞被打死。这天正赶上下大雨，毒打完了后，他们又将一个个遍体是伤的劳工，绑在露天里。大雨下了三天，我们在外边淋了三天，饿了三天。三天之内被打死，折磨死的有三

百多。我就是那次因冻饿和遭受毒打落了痍病，至今未好。

为了叫我们继续为他们干活，三天后，才放了我们，开始给点吃的，同时对我们的看守更加严格了。

在秋田，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我们去时一千多人，到回来时不到四百人，半年内死掉七八百人。我们那个小组，去时十几个，最后活着的，只剩下我们几个人了。

日本投降后，于十一月我们回到祖国。

## 智勇相辅 制敌取胜

——抗日战争时期张醒民同志在东阿

广典华

张醒民同志是一九三九年初调来东阿工作的，尔后于一九四〇年下半年由公安局学习结业又重返东阿从事武装斗争和公安工作。县公安

局初建时，李健民同志任局长，醒民同志负责侦察工作，曹子奎同志负责审讯工作。全局除了警卫武装共有干部十余人。当时环境恶化，人少事多，一人多用。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伪军政情报，加强锄奸防特，维护地方社会治安，争取分化瓦解敌伪人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打击日寇。一九四二年间，出自对敌斗争的需要，成立了县武工队，史光同志任指导员，醒民同志任队长。那时，日寇对我根据地推行蚕食和碉堡政策，曾先后在广粮门、陈店子、铜城镇、教场铺、张汉吴、张大人集、西程铺、杜庄、凌山、尹庄等地建起了日伪据点二十余处。每个碉堡驻有伪军汉奸武装，主要据点还驻有日军，并在县境内挖了四条纵横全境的封锁沟，修筑了数条公路，妄图分割消灭我抗日政府及其武装力量。当时形势十分恶化，敌我斗争极其尖锐复杂，县里的武装力量只有县大队和公安局的服务队。各区虽有区分队，但人数甚少。敌我力量十

分悬殊，仅铜城据点就驻有日军百余人，伪军近三百人，还有日本宪兵特别工作队，队长孟广福是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他认贼作父，为敌效劳，经常带队刺探我方情报，逮捕我地下党员和抗日人员，对我危害甚大，如耿集村党支部书记、我公安工作情报网的领导人李建领同志被孟广福抓到铜城据点进行严刑拷打，追逼地下党的组织。县局的同志常住大周庄周传浩大伯家里，周大伯两口一直给我们传送情报。铜城镇的雷玉良同志早系我公安工作的情报人员，都曾先后被孟广福抓到据点里施行毒打、过电等酷刑，妄图得到我地下党的情报组织的情况。由于上述同志忠贞不屈，使其阴谋一一落空。孟广福还经常带领日伪武装到处烧杀抢掠，积极推行日寇的“三光”政策，致使人民群众日不聊生，处在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

## 深入虎穴，击毙特务头子孟广福

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日寇，醒民同志曾对孟广福进行过多次的争取教育，并通过该队的副队长王德方（我方工作关系）侧面对孟广福做过劝告说服工作，要他改邪归正。但孟广福不仅毫无悔改之意，反而对王德方、刘恒栋气势汹汹地说，张醒民没啥了不起，他又不是三头六臂，不足为怕。还一再扬言说，谁私通八路我就枪毙谁。根据上述情况，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坚决除掉这个人民的死敌，以达杀一儆百，进一步分化瓦解敌人之目的。

醒民同志接到除掉孟广福的任务后，为了摸清他的起居情况及其活动规律，首先着手侦察，先后多次化装进入铜城据点和孟广福住处进行实地观察。还几次找到了当时住在碉堡附近的我方情报人员秦敦汉同志，向他具体交待任务布置工作。敦汉同志一接到这一任务就非常高兴地说：

群众早就把这个十恶不赦的家伙恨透了，杀掉孟广福为民除害。

经过敦汉同志几天的侦察了解，孟广福这个作恶多端、死有余辜的特务头子已经看到了人民力量日益壮大，自知罪大恶极。人民群众是绝对不会饶恕他的，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因此，也就更加凶残狡猾。一方面他三天两头地带领日伪武装到各据点“督阵”，令其亡命之徒加紧“清剿”，疯狂地进行“扫荡”，以此来加强其“治安”，维护日伪统治；另一方面，在日常行动及生活中无不时刻戒备，出入无常，行踪难寻。有时住在炮楼，有时在他小老婆处住宿，神出鬼没，概无规律。

针对孟广福凶残狡猾、且时刻防备的特点，为避免打草惊蛇，醒民同志选定了孟较麻痹的处所下手，决定在其小老婆处把他除掉。要实现这一设想方案，那就非把现场和孟的日常活动搞清楚不可。几天后的一天，时近黄昏。醒民同志在

铜城南关秦文清家正要吃晚饭，敦汉同志突然来汇报说，他已侦察到孟这天夜晚确实在他小老婆处吃中药，因为嫌乱，令其卫兵回炮楼住宿。据此，醒民同志当机立断，急返我部驻地，当夜带领陈金贵、孟英、杨继贤、陈世忠、袁子荣、谭子清等同志从王海子村急奔铜城敌人据点。首先捕获了城东门的哨兵，按照事先规定的路线和分工冲进了孟小老婆住处。当时孟正在炕上躺着，突然发现张醒民冲进室内，急忙从枕下抽出匣枪跃身坐起，杀气十足地准备决一死战。醒民同志看到这一情景，便纵身抢先一步跳到炕上夺下他的匣枪，并立即向他开枪射击。孟颇有拳术，力气过人，他用力拨挡醒民同志的匣枪，因而未将他击中，随之醒民同志和孟便厮滚在一起，由屋内扭打到屋外。在这残死相斗的关键时刻，醒民同志只好让继贤用手枪猛击孟的头部，将他打昏后，又当即对准其头部开枪射击，打了个天门开花，脑血四溅。醒民同志等完成击毙孟广福的任

务后，迅速撤离孟的住处，冲出了铜城据点。这时敌人惊闻枪声，炮楼内枪声大作，人喊马叫，乱作一团。除掉孟广福不仅广大群众拍手称快，而且敌伪内部震动很大，有些汉奸头子开始主动地与我们联系，为我们工作。驻陈店子据点的日伪中队长赵子清以往顽固狡猾，作恶多端，害怕遭到与孟广福同样下场，也主动与我们接头，并表示以后不再做坏事，为抗日出力。

## 铜 城 解 放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由于加强了敌伪人员的争取瓦解工作，为和平解放铜城创造了有力条件。我们遵照上级指示，为了打通由铜城至濮、范、观的通道，决定尽早拔除铜城日伪中心据点。这时该据点驻有伪大队部和一个中队约200多人的兵力。伪大队副黄惠民系地下国民党员，因深受“曲线救国论”的影响，政治上非常顽固。开始醒民同志曾多次给他写信，做说服教育

工作，说明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只要是中国人就要有中国人的良心，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否则就会当亡国奴。起初他不睬不理，后来醒民同志给他写了封长信，让铜城的雷保香（我为线关系）送给同我有工作关系的伪中队长李尚友。让李偷偷地将信放在黄惠民的枕下。当黄发现这封信后，大吃一惊，知道自己的部下并非铁板一块，他惧于“暗算”，害怕遭到与孟广福同样下场，便想与醒民同志联系。因黄系“青红帮”三番子的成员，他便主动通过小秦庄的三番子赵春林送信，让张醒民一人到炮楼内接谈。为了争取他为我方工作，醒民同志“应邀”冒险一人化装进了铜城炮楼。这次双方谈的很简单，黄提出只和醒民一人发生联系，并要他绝对保密，醒民同志当即同意。尔后，醒民同志又多次进入碉堡对黄进行说服教育，争取他靠拢我们。从此，黄暗中给我们送了多次情报，做了不少工作。一九四四年春在我兵临城下准备攻打铜城的那一天，醒民

同志到炮楼与黄面对面地谈判，并将黄带到铜城西关由刘致远司令员出面与黄谈判，双方提出了各自的条件。刘司令员提出要黄带领所有伪军武装主动撤离铜城，我方保证一路不伏击、不阻击。迫于形势黄表示同意照办，但黄却提出要醒民同志亲自带路送往陈店子据点。行前黄还给我们留下了部分枪支弹药。当晚，黄部撤离时，我军为掩人耳目集中各种枪支鸣放，醒民同志带领黄的全部伪军三百人（包括伪区政府人员）去陈店子，行至雷庄以东回首西望时，铜城上空已是火光冲天，烟雾四起，敌伪的所有碉堡和军事设施全被我军烧毁。

敌人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黄部撤出铜城的次日上午，由近二百日军带领二千多伪军，在我军分区两个团兵力的不断阻击下，敌人仍反扑进攻到铜城，企图夺回他们已失去的阵地。但因为敌人已没有立足之地，才随即二次撤出铜城，返回了陈店子据点。

黄惠民部当反扑未逞重新撤离铜城之后，他带领李尚友中队暂停在王海子前小崔庄找到崔某某，要崔火速寻醒民同志见面，黄决心带队起义。因那天上午醒民同志正在刘集分区二团的指挥所待命，黄、崔没有找到醒民同志，致使黄的起义没达目的。

铜城据点的和平解放，打通了由铜城通往濮范、观的通道，为进一步扩大巩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回忆张醒民同志在东阿县工作的日子里，正处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敌强我弱，环境艰苦，斗争极其尖锐复杂。他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己任，无限忠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不避艰险，无数次地深入虎穴，先后击毙了一批孟广福之类的日伪忠实走狗，在敌伪人员内部做了大量的教育争取工作，分化瓦解了敌人，从而使我县的日伪据点均能得以顺利的解决。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他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高举抗

日救国的大旗，认真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我方力量由弱到强，不断打击消灭敌人，直至取得最后胜利，根本的一点是依靠了人民群众。由于我们同广大人民群众有着血肉相联的密切关系，所以在极端困难艰苦的环境下，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支援我们，否则将是一事无成。

我们每当深情地忆起醒民同志结识最早、接触最多的党和政府的亲密朋友、忠诚的爱国知名人士王风周先生，他的老房东王玉荣大伯、侯允平叔叔、周传浩伯父母，还有雷保香、姚瑞祥、姚元领、井延领等等，无不使我们深为感激，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们都曾主动给我们送粮、送情报，为我们的安全站岗放哨，日夜操劳，使我们能够不断地打击敌人，取得了敌斗争的胜利。几十年来，正是张醒民同志无私无畏的革命献身精神，以及为抗日战争做出卓越贡献的广大人民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他们的伟大功勋终生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附：

### 王风周先生传略

我们党的亲密朋友，忠诚的爱国知名人士王先生风周，字伯韶（1899—1947），东阿县铜城镇王家海子村人。早年在我们党的崇高事业的影响下，热爱教育事业，积极兴办学校，为培养革命后代倾注了很大心血，做出了优异的贡献；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他严以律己，克己奉公，为乡政建设，为人民群众较大方面的福利事业，为乡里间的团结和睦，日夜奔波，竭尽辛劳；他有相当高的民族觉悟和爱国热忱，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难的严重时刻，深为中华民族的存亡所忧虑，于是教育了相当多的年青一代，积极奔赴抗日。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在敌伪碉堡林立极其险恶的环境里，他毅然不顾个人及全家人的生命危险，掩护了我党和抗日政府许许多多的

领导同志及其家属。1942—1943连年大旱灾年，东阿县委和抗日政府的许多领导同志日日夜夜出入于他的家中，抗日第四区公所亦隐居在他家里办公。在敌我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生活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为我们的食宿、为我们的安全日夜操劳，使我们能够艰苦的坚持抗日斗争，不断地取得了对敌斗争的胜利。因为他的革命举动，1943年秋季被铜城汉奸据点内的治安军头子孟学祖以私通八路的“罪名”逮捕到炮楼上，敌人妄图从王先生口中了解我方情况，伺机消灭我抗日力量。他受尽酷刑，忠贞不屈，使敌人的图谋未能得逞，经我政府多方营救才得以脱险。

几十年来，党和政府的许多老同志每当忆起王先生的生平事迹，无不为之深受感动，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正是由于他崇高的民族觉悟和爱国热忱，他无限忠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无私无畏的革命献身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李群 宋诚

## 老东阿县立 高级小学情况的回忆

岳克寒

“七七”事变前，我曾任过老东阿县立第一高级小学的校长。五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当时的情况，只能作简单的不全面的回忆。

老东阿县城，在黄河东岸，距黄河约八里路，在狮耳山和少岱山（亦称小泰山）下，三面环山，浪溪河穿过县城的中心，把县城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东城，一个叫西城，中间有一石桥，把两个城连在一起，老县城的自然景色还是不错的。老东阿县立高级小学就设在西城的旧书院内，所以也叫西城小学。老东阿县城，现改为平阴县东阿镇。

当时，全校有四个高小班，两个初小班共有学生250余人，教职工十五余人，课程设置有

语文、算术、地理、历史、自然、卫生、音乐、体育等。校舍面积约四亩多，房子六十余间，学校设备简陋，没有运动器具，更没有供学生课外阅读的图书，学校经费极其困难。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根本没人重视小学教育。当时，我为了使学生有点活动的器械，经校务会议研究通过，卖了两棵树，添了点学生运动器械，如篮球杆、秋千、双杠、单杠等，后呈报备案，还受到了国民党县政府的斥责。“七七”事变前，全县还没有一处中学。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执行不抵抗政策，对国内革命群众进行残酷镇压，使日本帝国主义很快侵占了我们东北三省的国土，使东北三千万同胞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遭受蹂躏，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由于国民党的卖国政策致使日寇侵占中国的野心越来越大。同时，也激起了爱国人士特别是青年对蒋家王朝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怒和仇恨，他们积

极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当时，在东阿高小毕业的相当多的一部分学生都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革命工作。

据我回忆，在老东阿县立第一高小毕业的学生，印象较深的有：张少溪、辛斧、王宪武、房燕卫、刘恒璃、张建新、王仲民、黄连晋、王梦芳、赵传淮、雷震等。

张少溪原名张学濂，东阿县红庙村人，与张盛斋同志是一个村。张少溪同志在高小读书时，在二年的学习时间里，每学期的考试成绩都是第一名。张少溪同志思想进步，毕业后奔向了革命的道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曾任中共东阿县委宣传部长，后来，在与东阿县城敌人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辛斧同志原名谭丙岱又名谭波，东阿县谭庄人。东阿县立高小毕业后，即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一九三六年前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中共东阿县委委员（军事委员）。一九三九年初

东阿成立了武装工作团，辛斧任团长，41年初东阿成立了独立营，辛斧任教导员。当时我在东阿县抗日县政府任财政科长，县长是苏民，教育科长是李常青同志。在艰难困苦的年代里，我和辛斧同志不断接触。后来独立营升级了，辛斧同志也随部队升了级。现在辛斧同志在中央军委总后勤处任政治部主任（军级干部）。83年我去北京时，在总后见到了辛斧同志，辛斧同志生活朴素，待人很热情。

刘恒璃同志是东阿杨柳乡刘集村人，在东阿高小十四级一班毕业后，即参加了革命工作。在50年至51年间曾任东阿刘集区区长，以后任东阿县政府财政科长、财贸部长、副县长等职。67年调聊城地区机械局任副局长至今。

王宪武同志是东阿旧城人，东阿高小11级学生。曾任过东阿教育科副科长，东阿一中校长，阳谷一中校长。王宪武同志，在阳谷一中任校长时，因工作深入，团结教师，曾多次受到上级的

表扬，并在全地区校长会议上作报告，介绍工作经验。因公积劳成疾，于84年在阳谷一中病故。

黄连晋同志后改名黄鼎三，东阿县黄屯村人，十三级学生。38年党送他到延安学习，参加部队后，曾任团政委。后转业到某军工厂任总指挥。十二级干部。于1985年在四川峨嵋山病故。

雷震原名雷庆良，东阿郭铁匠村人，12级2班学生，曾任东阿四区区委书记，41年曾任东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现在中央石油部工作，司长级干部。

房燕卫同志是东阿鱼山人，在东阿高小13级1班毕业后，曾任东阿徐屯中学校长，后病故。王梦芳同志是东阿沙窝村人，东阿高小12级学生，毕业后曾任东阿民政科长，秘书等职，现在聊城城关镇当秘书。张建新同志原名秦广武，东阿朱旺山人，曾任聊城市市长，后病故。赵传淮同志是东阿广粮门村人，东阿高小14级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军到四大队，后到四大队二中队当教导员，在一次战斗中牺牲。王仲民原名王庆笃，

东阿刘集乡张庄人，15级学生，参加革命后，曾任东阿二区和五区区委书记、县委办公室主任，58年调地区化工局办公室任主任至今。

这样多的学生毕业后，积极投身革命，进步教师对学生起了重要作用。在“七七”事变前的二、三年里，学校里的进步青年教师有；苏群、汪洋、姜湘南、张盛斋、黄会三、李耀卿等。他们在课堂讲课时，总是在讲课前或是在讲完课后，向学生进行形势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前途教育，学生受影响很深。同时，在课外活动时间，对学生进行个别谈话，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教师之间紧密团结，能深入联系群众，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在1935年和36年之间，以汪洋、姜湘南为主的几个青年教师，向国民党县政府教育科长展开了斗争。反对他的任用私人和贪污行为，并印发了反对教育科长的传单，传单贴到东阿城里并分发到各区乡，同时，也分发到济南、北京等地。开

始是秘密的，后来转向公开。经国民党县长庄守忠出面干涉，迫使汪洋、姜湘南等几位教师离开了东阿。汪洋、姜湘南等几位教师对教科长的斗争，我内心是同情和支持的，传单就是在我室内的油印机印刷的。但由于我所处的校长地位，当时，没有公开支持。

苏群原名苏长宗又名苏得卿，东阿西程铺人，与苏民同志是一个村。苏群同志是东北大学毕业。1938年曾在莘县县政府当教育科长，我是莘县县政府民政科长。那时，在聊城地区南部的四个县的县长都是共产党员，寿张县长管大同、范县县长周子明、阳谷县长徐茂里、莘县县长吕世隆都是共产党员，因为统战问题，党的活动还未公开。1938年11月17日，在国民党反动派李树椿、王金祥的唆使下，莘县公安局和县大队叛变，杀害了吕世隆同志。我和苏群同志都逃出了莘县。40年苏群同志任邱县县长，43年后任冀南三专署民政科长，专署秘书主任等职。48年苏

群同志负责邯郸至馆陶铁路办事处的工作，就在48年苏群同志和他的爱人、孩子三口人，在肥乡县被国民党唆使下的反动道会门杀害，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深感悲痛，同时，更增加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

汪洋同志原名汪之正，是东阿顾庄人（现划归河南省）。汪洋同志在济南乡师毕业后，曾在东阿县立高小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师。他在教师中是一个很活跃的同志，他团结教师，爱护同学，积极向学生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启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汪洋同志在教师和学生中威信很高，当时学校中进步空气很浓厚。抗日战争爆发后，汪洋同志即走上了抗日救国的征途。汪洋同志在济南乡师读书时，已是光荣的共产党员。抗日战争期间，汪洋同志曾任过团长、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旅政委，后调泰山军分区任政委兼党委书记。1942年10月17日在莱芜吉山战斗中壮烈牺牲。那时年仅29岁。现在提起汪洋同志来，我心情还久久

不能平静。74年清明节时，我和爱人赵淑贞同志，曾到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去瞻仰汪洋同志的坟墓，以表对汪洋同志的怀念。

张盛斋同志又名张道隆，东阿红庙村人。张盛斋同志的家庭，是革命的家庭，张盛斋同志的二弟张道宽，儿子张立民都是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他的家庭是我们抗日工作人员，经常来往的地方。张盛斋同志在东阿高小当教师期间，为了深造，他和黄会三同志报考了山东省立第三师范（聊城），因全面抗战开始了，未能毕业。张盛斋同志待人和蔼可亲，工作认真负责。在1940年到41年张盛斋同志曾任东阿县委秘书长。1938年12月张盛斋同志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张盛斋同志于1942年病故。

革命的烈士们，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的今天，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是来之不易的。我们要学习他们英勇奋斗和自我

牺牲的精神，要学习他们艰苦朴素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尚品质，要学习他们善于团结同志，热情待人的作风。革命的先烈们，你们为了国家民族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英勇的牺牲了，我们这些幸存者，将永远怀念着你们。我们要把自己的余热，献给国家，为把祖国建设成四化强国而奋斗。

## 张 盛 斋 传

杨志高

张盛斋烈士名道隆，字盛斋，东阿姜楼乡红庙村人，生于一九〇八年，逝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享年三十三岁。是我县第一代革命者，优秀的共产党员。

其父张殿富，是一个爱国的民族主义者，曾任本村学董和教师。在他爱国主义思想薰陶下，红庙村青年，有不少人都走上了革命道路。三儿

一女，都参加了革命，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盛斋同志小时曾随其舅父杨立荣（冯玉祥部军需官）在北京军官小学就读，一九二〇年后，入北京青明中学，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直皖战争爆发后，学校停办，回本村任教员，继续宣传进步思想。一九三〇年，应徐子廉校长之聘，到东阿县立第一高小任教。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思想，培养了大批进步学生。谭秉岱、张少溪等都曾跟他上过学。一九三五年暑假，去聊城第三师范上学，在《湘江评论》等进步书籍的培育下，思想更加进步，积极参加学校的政治活动。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时，组织领导召开了纪念会。西安事变时，深入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七七”事变后，学生中有人提出，要抗战得去南，入国民党军官学校。他则及时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大声疾呼：“鬼子从北边来，叫我们到南边去，纯属欺骗，我们要回乡打游击，不做亡国奴。”在他的带动下，东阿、平阴、阳谷、聊城

等县的同学，都回本地，参加抗日活动。

一九三七年，汪洋、姜湘南等领导了东阿县三百余名教员，和国民党县党部及教育科长王占一，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斗争，盛斋同志多方予以支援。使他们免遭毒手，奔向延安。六月回乡建起红庙支部，任支书，支部组委张效申，宣委张少溪，积极发展党员，扩大组织。仅红庙发展党员三十七名，后又扩大到刘屯、西寺、刘塘坊等村。为东阿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东阿、聊城沦陷，十二月，东阿县委决定建立武装小组，开展抗日游击活动。三九年，支持张效申、杨培茂、冯立荣，夺取宣化乡乡政权，开展合法斗争。徐翼领导的聊阳阿四大队建立后，派党员张玉建为内应，去曹寺夺取自卫团枪支一百二十支，并就地处决了伪队长苏振江。为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贡献。为了扩充队伍，增加兵源，并动员其二弟张道宽带领红庙青壮年参加了

四大队，并做了三中队指导员。

一九三九年十月，县委在魏庄开会，宣布通过领导人名单，盛斋同志任秘书长。为筹备组建东阿抗日民主第一届政府，日夜奔劳，不辞辛苦。经过周密的筹备组织工作，于四〇年元旦，在葫芦头诞生了东阿县第一个人民政府。从此，使东阿县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新斗争时期。

一九四一年，敌人更加疯狂。建碉堡、挖封锁沟，进行扫荡。当时敌强我弱，环境恶化，敌人又指名要他的人头。有次，敌人专门包围红庙村，扬言要抓到他，他在红庙王家胡同群众掩护下，脱离了危险。长期的武装斗争和游击生活，他积劳成疾，在缺医少药，生活都没法安定下，仍坚持去大店、井杨等村，做发动群众工作。在病重期间，党派人抬着他逃避敌人扫荡，他在病榻上还耐心做思想工作，宣传敌人必败，抗日必胜的道理，鼓舞了士气，坚定了群众的必胜信

心。

一九四一年古历十一月二十三日，正是严冬季节，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盛斋同志以三十三岁的年华，为人民鞠躬尽瘁，与世长辞，葬于故乡祖莹。地委、县委送来了挽联和花圈。无数党员和革命群众也都热泪盈眶到灵前致哀。

盛斋同志的逝世，是东阿人民的极大损失。他一生光明磊落，关心群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和楷模。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在盛斋同志的带动影响下，全家都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二弟道宽、三弟道昌、小妹桂莲，都在三七年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艰苦的抗日时期，其三弟以二十二岁的青春，就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其妹桂莲，曾以巾帼英雄的大无畏气概，在敌人刺刀逼迫下，不妥协，不畏惧，不动摇，使藏在他家的当时县委书记现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赵振清同志，安全脱险。

盛斋同志，严以律己，教子从严。他有一儿一女，也都在他的教诲下，参加了革命，锻炼成长为我党的好接班人。其子立民，以很小的年纪，于四三年就入冀鲁豫第四游击中学学习，四五年参军作战，后渡江南下，继承他父亲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现在贵州工作。十年浩劫中，以铮铮硬骨，顶住了“四人帮”对他的诬蔑和迫害。

盛斋同志，安息吧！你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已经到来。英明的党中央，正在领导全国人民，调动和团结一切积极因素，为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而奋斗。你和无数先烈洒下的鲜血，已使东阿故土经济起飞，山河吐秀。当我们欢庆盛世，歌舞升平的时候，我们没有忘记你，你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 一个知识分子的历程

——知名人士孙广彬

曹桂生

东阿姜楼高小的创始人孙广彬先生，是一个为国、为民献身教育事业的突出典型。姜楼高小是东阿革命的摇篮，它在东阿革命发展史上，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光照千秋，激励后代。

## （一）家庭

孙广彬先生，东阿县姜楼乡孙庄村人，生于1876年，卒于1960年，出身于富农家庭，书香门第。父亲早年病故，留下兄弟四人，老大孙广清，老二孙广彬，老三孙广环，老四孙广多。除老二老三有文化外，老大老四在家务农。孙先生前妻早年病故，后又娶咸氏，但两夫人均未给留下后代（绝户）。侄儿有六个：朝梅（去世）、朝营

（在家务农）、朝礼（现在牛店棉厂）、朝贵（在家务农）、孙明（现在济南），孙沂（现在北京）。

## （二） 献身教育事业

广彬先生自幼读书，由于聪明好学，步步登高，1931年毕业于济南政法大学。毕业后，即回故乡孙庄。在家曾想积谷放赈做些慈善事业。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烧杀蹂躏之惨景他不忍睹，便激起他爱国、救国之心，认识到打倒帝国主义，拯救国家之危亡，必须唤起广大民众，于是决心办教育。

当时，东阿县四个区，唯独姜楼没有高小，姜楼又是个大区，人口多，学生广，若要上高小得步行几十里，特别那些穷家子弟，远离家乡，外出求学，困难就更不堪设想。面对现实，孙广彬先生便主动找姜楼区的知名人士，以及附近亲朋，取得他们的支持，决心在姜楼区姜楼村西头

古庙内设一处高小。高小地点设在姜楼，当时引起一场大的风波。南半区的人坚持要把高小设在刘集，并且有区长魏以栾的支持（魏是刘集人）势力比较大。南北之争曾一度告到县里，当时县长周竹生又是个和稀泥的人，事情闹的很僵。孙先生这时并不灰心，后来在他的多方奔走、说服、动员下，才算勉强定下来，其周折困境不必再叙。

民国廿一年，即1932年，姜楼高小宣布正式建立。呈请孙广彬任学董（即主办人），魏以绍任校长，司安国（现政协常委）、孙朝梅（去世）两人任教员。

办学就需要校舍、桌椅、床张以及其它开支，当时经费是非常窘迫，上级每年只拨二百大洋，其余归地方自筹，筹款又筹不上来怎么办，孙广彬先生给大家（指安国、朝梅以及支持的人）说：“学校好不容易成立了，我们要忍受一切，想尽一切办法办下去。”他本着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的原则去做。校舍决定在古庙大殿内，庙内有泥胎

神象，孙又亲自带领师生拉神、除泥胎。拉神又引起了一些老人的非议，尤其是那些富有迷信色彩的神姑、神妈们组织起来煽动群众去学校闹事，并且上告到县、省说是破坏庙宇。孙先生这时一面好言劝说，一面又组织师生上街游行呼口号，以表示威。后经说服教育，群众有了认识，那些顽固派上告不成，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泥胎神象才算除掉了，学生有了教室和宿舍。没有桌凳床张，孙先生除叫学生想办法外，又发动群众支援，自己多方奔走去借。就在这因陋就简的原则下，学校正式上课了。第一期只招了一个班，学生40余名。我们的老干部苏民、王玉珍、刘万明等同志，就是第一期毕业的学生。第二、三、四期培养的学生更多，有不少现在是我党的高级干部。

在办学期间，孙先生都是每天步行回家吃饭，离家三、四里，往返奔波总是不嫌累。早起晚睡以校为家，每星期六还给学生训话、进行教育。一个无党派人士能抛家舍业积极办学，这种精神

是何等可贵啊！

### （三） 关心青年、爱护党的组织

孙先生对进步、爱国青年，尤其我们的党组织更是积极爱护的。1933年暑期，在济南乡师求学的姚仲明（党员）同志，从济南回来，孙对他的进步思想很表赞成，便立即把他聘请到学校当教员。谭波（党员）在太安学校闹学潮被开除回家后，也立即把他聘到学校里任教。

“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很快占领了东阿，并且在姜楼、广粮门等地筑起了炮楼，姜楼高小停办，鬼子、汉奸的猖獗，一时造成白色恐怖，给我党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我们的党员干部和党组织更得秘密艰苦一些。这时孙先生全力支持党的工作，掩护党的组织，作了不少贡献。为了革命，为了更进一步的开展工作，我们党的干部苏广才、姚仲明、赵健民等都在孙先生家隐蔽过。有什么事情或党的文件都是通过他联系和往外送的。这就是说我党之所以能在敌人眼皮下

继续深入工作，这和孙先生热心帮助是分不开的。孙先生虽出身于一个富农家庭，但他的所作所为已背叛了自己的本阶级，一个旧知识分子向着自己应走的光明大道迈进。所以后来被我党吸收为正式党员。

姜楼高小停办后，孙先生更看到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他认为作为一个爱国人士在此时刻更不应停止不前，于是回家后又在本村办起了一个小学班，有学生20多个，教室在自己家西屋内，自己教，费用自己备，除教知识外，对小學生都进行些爱国教育。他这种爱国办教之心是多么可敬啊！

#### **(四) 为人忠厚、善良、大做好事**

为党、为人民有贡献做好事的人，人们是不会忘记的。1958年左右，由于党内极左路线和自然灾害，造成人民生活极端痛苦，不少人饿死。村里为了照顾老人，成立了幸福院，他第一个被

请进去，并且叫他当院长。这说明村民敬重他、信任他。他也不辜负大队对他的信托，在敬老院里，他领着12个老头，给大队要了二十亩地，五亩种瓜、五亩种菜、十亩养榆树苗。当时全村吃的菜都是敬老院送给的。至今还很多人回忆说：在那个困难时期，亏得敬老院的一些爷爷们。是的，在那极端困难时期，一把菜就可能救一条性命。除此以外，他还经常打扫街道，修路，做些好事。

在为人处事方面他也特别突出，对人说话和气，爱帮助人，特别是穷苦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遇到人吵架、打架，他总是极力劝说。有一次在街上遇到本村两个小孩正在打架，他过去不仅拉开，而且说服教育，最后两个小孩和好，高兴而去。象这样的事，他是经常做的。他的再一个特点是爱讲故事，讲起来很有风趣。村里的大人、小孩听他讲的故事很多，从中也受到了很大教育。现在一提到他，都说：他是一个忠厚、善良的老

人。人们没有把他忘记。

1960年，由于年老、有病，再加上生活不好，不幸在幸福院去世。享年84岁，死前一小时还叫夫人把大队书记（宝增）叫到自己跟前嘱咐他今后好好工作。

孙广彬，一个旧知识分子，走完了他应走的道路，给党给人民做了不少好事，特别是在教育事业上的贡献上。他的一生是光明的，磊落的，人们没有忘记他，是的，是不能忘记的！

## 杂 技 之 乡 话 杂 技

曲绪宏

杂技，是一门综合的艺术，它包括武术、体操、马戏、魔术、舞蹈、音乐等，既有中国古彩戏法，又有现代西洋技艺。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个艺术门类，在我国渊远流长，是民族艺术中的一个颇受欢迎的传统项目。

杂技，过去又叫古彩戏法。演员以灵巧的手

法，精湛的艺术，造成观众视觉、听觉上的错误、表演各种物件、动物或水火等迅速增减隐现的变化。东汉张衡所写的《西京赋》中，就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汉代杂技中的吞刀、吐火、画地成水等精彩表演。北齐颜子推在所著《颜氏家训》中谈到：“世有祝师及诸幻术，犹能履火蹈刃，种瓜移井，倏忽之间，十变五化。”宋陈旸所著《乐书》中，也有记载。汉唐称“幻术”、宋谓“藏挟技”。以后，和马戏等合并，统称杂技。原来的马戏是一门单独的技艺。汉桓宽《盐铁论》载：“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唐宋时专称驯马和马术表演。后来发展为驯兽及杂技表演的统称。不仅有马术及狮、虎、熊、狗、猴、羊等表演和技巧动作，还穿插杂技及丑角的表演。过去一般在广场中，有的扎棚，有的画地作圈，道具简单，形式灵活。随着历史的推移，技术项目的不断充实和完善，逐渐登上了大雅之堂。除马术外，一般均可在舞台上演出。服装、道具、灯光、音乐

都得到了改善，杂技艺人的地位，也大大提高。

东阿，地处鲁西黄河之滨，几千年前，人类就在这里生息劳作。艰苦的生活环境，养成了北方人的粗犷、豪放、勇敢、武猛的性格。自古以来，这里的人们就习武弄棒，玩杂技，走江湖。据说唐朝威震朝廷的杂技艺人花自芳、花碧莲父女，其祖居就是东阿。清朝话本说的女侠十三妹，也曾在这里练拳习武，行侠尚义。流行多年的“拳不打铜城”的历史佳话，正是对东阿人民习武尚勇的褒奖。这里多次暴发农民起义，是梁山泊活动的基地。捻军、黑旗军、义和拳中，也有不少东阿人英勇参加。长时期来，这里的人民，人人会拳术，家家习软功，村村练杂技，庄庄有马戏，是我国有名的杂技之乡。

解放前，杂技艺人的生活是相当苦的，玩马戏变戏法是为了挣饭吃，受尽了剥削阶级和地痞流氓的压榨和欺凌。杂技被打入“下九流”，艺人被侮辱，被残害，留下不少血泪斑斑的历史故

事。不少艺人只要有一线之路，就不再去走江湖卖艺，只把杂技当作农闲时的一种业余爱好，过春节时，自动比赛，表演一番，使这门艺术，长期停滞不前，濒临衰亡。共产党来了以后，人民真正翻了身，做了国家的主人，艺人才有了社会地位，杂技艺术才真正迎来了春天。

过去，杂技艺人，被叫成“跑马卖艺的”，“变戏法的”，“爬大竿的”。多是一家一伙，三、四人，六、七人不等。用小推车一推或扁担一担，到哪个村一搁，锣鼓一敲，地上一画圈，叫做打场子，就开始散筷子或竹签。演完一段，观众有的给点煎饼，有的给碗糊糊，也有的给个铜钱，艺人赖以度日。我县曹孟庄、张大人集、高圉、胥寺、郝庄、胡庄、芦庄、葫芦头、皮袄李、张集、李堂、西关等村，都有不少杂技艺人，为生活所迫，走江湖卖艺为生。日本鬼子进中国后，他们有的参加了八路军，有的用自己的超群武艺，斗敌顽，取匪首，演出了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

曹孟庄孟广富艺班，在沂蒙山区演出时，曾被日本鬼子抢马毁棚，在曲阜演出时就配合八路军打散了日伪强盗的合伙抢掠和侮辱。以后又参加了解放高密、潍县、济南战斗，表现了杂技艺人的威武不屈和抗争精神。葫芦头老武术艺人王友亮（即子明）抗日时期曾跟阳谷县长岳舜卿搞武装斗争，以演技献艺为名，深入七级敌穴，将强敌消灭。

东阿近代杂技艺人，较早的是铜城镇北贺庄的张朋方、李金枝，他们学艺于长清李半仙。张大人集张正震，曹孟庄孟继乾（草上飞之父），系出于张氏门下；曹孟庄孟继功（广富之父）、皮袄李陈正祥系李金枝之徒。张正震会一身武功，青年时在朝鲜闯荡十三年，1938年才回国。他们都是全家学艺，门里出身，功底较好，在江湖上颇负盛名。

建国初期，我县有组织的杂技团体有八个，他们每个团，都有由县委派去的指导员，八个团

依次是孟广富团（曹孟庄人）、张正震团（张大人集）、孟继乾团（曹孟庄孟广连之父）、苗振祥团（铜城西关）、张更汝团（刘集芦庄）、陈正祥团（皮袄李）、孟继亭团（曹孟庄）、杜尚彬团（七团孟继亭团分出，高固人）。1956年公私合营时，由上述八个团合并为东阿马戏杂技团。其它还有刘庆一马戏杂技团（陈集胡庄）、景发祥马戏杂技团（刘集芦庄）、郎殿公马戏杂技团（刘集胡芦头）、齐金昌马戏杂技团（胥寺）、张大辫子（艺名）马戏杂技团（贺庄）。1958年，聊城地委与行署调演约二百余人，除七团去山西未回外，其余均去聊城汇报演出。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杂技团都派人出席观摩和指导，盛况空前。当时正开展政治运动，原有各团团长一律免职，由孟广富任连长，杜春民任团长，改名为聊城地区杂技团。

七团从山西回来后，没去地区，留在县里，又重新组织成了东阿县马戏杂技团。

聊城杂技团59年去青岛演出，回济后，在济南艺校汇报演出。省里文化部门经观摩审核将聊城杂技团的演职人员留下了六十余名，成立了省杂技团。其中有名的艺人盖山东（李凤英）、孟大肚子（孟广富）任团长。其余的陈正祥等演职员归了德州，更名为德州马戏杂技团。

1962年，应东南亚几个国家的请求，在济南拍摄电影《齐鲁英豪》，除省杂技团东阿籍艺人外，还有德州和我县杂技演员。艺人草上飞（孟广连）做为特邀演员，表演了马上技艺，其孙悟空大闹天官节目，留下了精彩的镜头。

著名电影《红牡丹》，就是以德州杂技团为基础拍摄的，其中演出人员大部为东阿籍。目前德州杂技团有五个团长，其中三个是东阿人，他们是陈大成（陈正祥之子，皮袄李人）、秦中青、秦玉生（铜城西关人）。著名东阿籍演员有陈大成，陈大兰、郎爱芳（葫芦头人）、张桂苓（张大人集），他们为发展德州地区的马戏杂技，做出了应有贡

献。

1972年，我县以“草上飞”孟广连为首的杂技团，收归聊城地区所有，约五十余人，更名为聊城杂技团。其人员大部分为东阿籍人。杂技之乡、暂时出现无正式职业性杂技团体的局面。74年以秦绪民为首，又成立了约40人的杂技团。75年，停演一年，76年8月该团又恢复演出，秦绪民为指导员，臧绪生为团长，后发展到70人，分为两个队，取名叫东阿马戏杂技团。84年因故解散。党的富民政策，使杂技之乡富了起来，群众纷纷要求丰富精神生活，不少村庄会杂技的艺人，个人或联合组团，买马匹、置道具，练功习艺。他们不要国家投资和补助，既为国家分忧解难，又为繁荣艺术，传播精神文明与健康娱乐服务。目前经县文化部门批准，县演出公司发演出许可证的艺术团体已有五个。它们是东阿县马戏杂技团，东阿青年马戏杂技团，东阿飞车团，东阿魔术团，东阿伏虎表演团。他们已分别去各地演出。县里还准备

成立一个大型武术气功团，大型轻功魔术团。

武术杂技学校，全县有30余处，较大的有古官屯武术气功学校。由老杂技艺人担任教师。杂技之乡，繁花竞放，万紫千红，幼苗青青，后继有人。

东阿杂技之乡的新老艺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约有一千余人。其中河北杂技团、内蒙杂技团、山西杂技团东阿籍艺人较多。山西长治杂技团，就是原东阿刘庆一杂技团组成的。

杂技节目，解放前最著名的有上刀山、爬大竿等惊险节目。刀山由二十四面铡刀组成，刀刃向上，组成刀山，上有南天门横杠，干顶子，演员凭过硬功夫，在干上完成艰难动作，赤脚在铡刃上腾跳。解放后，为了确保演员安全，已取消了这些节目。目前传统马戏杂技节目有近百个。其中马术有飞马倒立、苏兴背剑、飞马大站、城隍倒立碑、张飞大片马、蹬里藏身、八步赶铲、巧女撩梭、飞马骑射、百步穿杨、关公劈刀、一马

跨双人、一人骑双马、童子拜观音等。杂技有：空中飞人、狮子舞、双爬杆、大闹天宫、叶里穿花、双人对顶花盘、叨花、软术顶杯、杂耍、水流星、椅子顶、钻火圈、3—10把飞刀、空竹、高台定车、蹬技（蹬伞、蹬方桌、蹬坛、蹬缸、蹬板凳等）、高车踢碗、顶碗、摔跤、车技、武术、晃板、花棍、晃梯蹬碗、抗梯、抗杆等。气功有：铡刀剃肚、钢筋锁咽喉、油锤贯顶、脚上开石、头顶开砖、手指钻石、卷钢板、脑门碎瓶、单掌劈砖、大腿开石、双腿托人山、鲤鱼打挺、气断铁丝、肚捲石滚、吃火生烟、口中喷火、刀枪不入、稳如泰山等。滑稽节目有：争椅子、气球悬人、口技、照相、吃酒、甩木球、滑稽晃板等。魔术部分有：仙人脱衣、空匣取兔、大卸八块、飞杯不见、海碗飞鱼、空箱取物、空中钓鱼、剪绳不断、无中生有、空中取物等。这些节目，有的为古彩戏法、传统节目，有的为吸收移植，洋为中用。经过杂技艺人的辛勤劳动，推陈出新，节目越来越新颖、越高超、越

受人喜爱。省杂技团获得世界金小丑奖的蹬板凳叨花节目，即为我县艺人孟大肚子(孟广富)和其爱人李兆桂(古官屯兴隆村人)62年首创，其子孟昭朋和其儿媳沈宁继承完善，一举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目前省杂技团团团长郎衍之、孟昭朋、张占一均为东阿人。东阿籍演员除退休转行的外，仍有近三十人。如孟昭朋、孟昭好、孟昭光、孟昭军、孟广才、张占一、张占信、郑秀凤。有不少八级演员，艺坛名将，深受广大观众喜爱。

东阿，这个全国有名的杂技之乡，正以巨人的步伐，开拓的精神，继往开来，发展杂技艺术。青出于蓝胜于蓝，长江后浪逐前浪。我们相信，这枝祖国艺苑中的一秀，必将为四化建设和中外友谊，做出应有贡献。目前，省杂技团中东阿杂技之乡的后起之秀，正在访问欧亚六国，这是杂技之乡的骄傲。我们相信，在这中华腾飞的新时期，杂技之乡，将有更多更艳的杂技之花，争奇

斗艳，为国争光，为民献乐。

## 略谈东阿的戏剧

玉水 绪宏

戏剧是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人物扮演等多种成分构成的综合艺术。它渊源于我国秦汉的乐府、俳优和百戏。唐有参军戏，宋成院本，元时南曲、杂剧高速发展，明清则在戏文和杂剧的基础上，创建了传奇剧，将戏曲文学和舞台艺术溶为一体。解放后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下，各民族和地区，共有戏曲剧种三百六十余种。根据不同的艺术特点，可分戏曲、话剧、歌剧、舞剧等；根据不同的表演手法可分木偶戏、皮影戏等；根据音调、语言发源地和流行区域，有京剧、昆腔、秦腔、川剧、越剧、豫剧、河北梆子、山东梆子、吕剧、藏剧、壮剧等。

戏曲剧本一般用韵文和散文，分“折”或“出”，“幕”或“场”。剧中人物由生、旦、净、丑等角色行当扮演，表演上按不同的角色行当而有各种不同的程式动作和唱、做、念、打的不同特点。音乐体式上有唱曲牌的“联曲体”和唱七字句、十字句的“板腔体”或二者兼用。戏剧作品有悲剧、喜剧、正剧之分。按内容可分为历史剧、现代剧、童话剧等。

东阿地处山东西部，距河北、山西、河南较近。流行于这里的剧种有京剧、豫剧、评剧、吕剧、秦腔、山东梆子、河北梆子等。民间的村头巷尾或田间地头，经常看到荷锄而归的农夫和放牧的顽童，自由自在的高唱各种腔调。有些村庄成立了不少业余剧团，逢年过节演出，以示庆贺。如碱场候、姜韩、曲集、艾山、杨柳等，俗名子弟班。演员不拿工资，道具等由各村集资，大部为外来剧种。据说，在东阿牛店镇夏马头等村，曾流行一种叫“王皮”的剧种，被认为是东阿土生剧，

但由于没有流行开，后继无人而湮没。目前，东阿县属剧团，主要演唱红笛，即河北梆子。

河北梆子，乃乾隆末年（1795）山西蒲州梆子传入河北逐渐演变而成。也有的认为渊源于北曲弦索调，吸收高腔、京剧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剧种，以梆子按节拍，配以笛、弦，音调高亢、激越，表演细腻，流行于河北、吉林、辽宁、内蒙等地。表现了北方人民的粗豪奔放的性格，宜于表现悲忿情节的戏剧。盛行于东阿。

东阿河北梆子剧团，系由杨柳乡石佛屯村河北梆子剧团转化而来。建国前夕（1949年8月）随着人民的翻身解放，生活的逐步好转，群众迫切要求丰富精神生活，石佛屯艺人张洪文（唱老生）、张玉福（武生，洪文之子）在本村办起了戏校，招收了约三十名学员，传播技艺，一年后，又从外地招聘了二十余名演员，购买了约七千元的服装、道具，拉起了戏班，推举张洪文为团长，任命张维尚为指导员，挂牌为石佛屯河北梆子剧团，

开始营业性的演出。在聊城、德州、太安、菏泽、沧州、保定、石家庄、天津、郑州、安阳等地市活动，得到了观众好评。当时剧团主要演员有张洪文、张玉福、金仙苓、王西苓、张广山等。他们的行当张洪文饰架子生，张玉福饰武生，金仙苓、王西苓均饰青衣，张广生饰胡生（河北梆子中带黑髯口者曰胡生，白髯口者曰老生，花髯口者曰须生）。演出的剧目有《金鞭记》、《辕门斩子》、《王宝钏》、《铁公鸡》、《下河东》、《胡迪骂阎》、《草船借箭》等。

1955年7月，东阿县业余剧团在县城会演，石佛屯河北梆子剧团首屈一指。经多方研究协商，由文化科和文化馆写出报告，经县委批准，决定将该团改为县立剧团，并派高长河为剧团指导员。1956年9月，邵良成继任。57年10月高二次回团任指导员。1958年在东台县，剧团也随之合并为一个，因在平原有一个京剧团，和东阿河北梆子合并后，改称在平县京梆剧团，仍由高长河负责。

1961年在东分县后，东阿梆子剧团原班人马又回东阿，仍叫梆子剧团。在平剧团中擅长河北梆子剧的演员徐桂芬、马怀新、周敬廷、张金生，也随团来东阿。

东阿县河北梆子剧团演员中，造诣较深，演技较高，深受人民称赞、欢迎的演员有下列诸人：  
徐桂芬（1917—1981）：行当是青衣，从小学艺，根底较深。由于她做戏大方，扮相优美，唱腔圆滑，吐字清楚，在高唐、夏津、恩城、武城一带，名噪一时，1956年全省戏剧界会演泉城，获山东省演员二等奖。她拿手的剧目有《三娘教子》、《王宝钏》、《秦香莲》、《三上轿》等。

金仙苓，饰演青衣，嗓音宏亮，字正腔圆，赴河南、天津等地演出时，都以唱功博得观众喝采，其主要演出剧目有《金水桥》、《三娘教子》等。

马怀新（1909—1980）饰演老生，善长唱中音唱腔，表演逼真，其主要剧目有《辕门斩子》、

《走雪山》、《桑园会》等。

周敬廷（1907—1979）饰演文武老生，演技高超，做戏逼真，在河北、山东享有盛誉。艺名小花瓶，齐河何庄人。主要剧目有《泗水关》、《风鸣关》、《余唐关》、《战盘河》等。解放前曾与天津梆子剧院金刚钻、珍珠钻，石家庄梆子剧院赵鸣岐等同台演出多年，受到不少同行称赞。

张金生（1891—1964）饰演老生，艺名傻李子，在德州、聊城一带享有盛名。演出主要拿手剧目有《宫门挂帘》、《击鼓骂曹》、《草船借箭》等、

张洪文、张玉福父子二人，功底踏实，做功精湛，深受观众欢迎。一为老生，一为武生。演出剧目主要有《林冲夜奔》、《辕门斩子》、《战长沙》、《长坂坡》、《三岔口》等。

东阿梆子剧团自成立后，不断在原有剧目和唱腔上，推陈出新，古为今用。除演出历史剧目外，还上演了不少现代戏，不仅给人以艺术享受，还启迪了人们的思想觉悟，鞭挞假丑恶，赞颂真

善美，宣扬了中华民族淳朴高尚的民族道德，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深入农村送戏到家，寓教于乐，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欢迎。干部和演员团结一致，艰苦奋斗，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建起了七万余元的家当。可惜十年动乱中，被付之一炬。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才又获得了新生。1966年到1971年，由张保木同志负责，后换秦绪民。1976年高长河再次回剧团任书记。1984年剧团进行体制改革，民主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

在中青年演员中，颇负盛名和大有前途的有李艳茹（女）行当老生，唱腔优美，扮相逼真，做派稳重，吐字清晰，在鲁西一带颇受观众欢迎，著名演出剧目有《孙安动本》、《打金枝》、《牧羊圈》等。其他中年演员还有刘树林（花脸），刘秀珍（青衣）。青年演员有荣秋莲（女），是石家庄梆子剧团张恩云同志的高徒，演技娴熟，刻苦努力，是后起之秀中的佼佼者，饰演青衣。其他还有张广荣（武生）、张广云（武生）等。不少青年，

热心学习，勤学苦练，使舞台表演技艺不断提高。

东阿梆子剧团，在改革的新时期，积极进行体制改革，越办越好。正以崭新的面貌，活泼清新的英姿，活跃于冀鲁豫地区，讴歌新时期，发掘古剧目，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收并蓄，推陈出新，使河北梆子这个剧种获得了又一个春天。

## 一代名人陈宗妣

鲁 莽

陈宗妣先生，原名陈建中，榜讳宗妣，字麓宾。生于清朝咸丰甲寅年（咸丰四年公元一八五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卒于民国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八月初三日，享年六十九岁。归葬东阿单庄乡青苔铺村。一生为官清正，酷爱藏书，诗、书、画均造诣颇深。双手能写梅花篆字，特别左手写的寿字中堂，龙飞凤舞，别具一格。

陈宗妣先生，出生于青苔铺村一个农民家庭，

其父曾贩卖过柿子，为供给他上学，卖掉一个杨树林。由于他刻苦学习，光绪五年（1879）己卯科考取举人，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科考取进士，时年二十五岁。进士及第后，踏入仕途，被清皇朝先后封为资政大夫，钦加二品衔；特授度支部左丞，特旨交军机处存记；钦派赴日本调查财政事宜和监修皇陵；大清银行监理官，上海户部银行总办；京察一等，特旨以四、五品京堂记名；道府、知府户部；广东司郎中；山西司员外郎；福建司主事。娶黄屯乡王道口汝氏女，诰封二品夫人。生有二子（士岱、士之）、四女。其弟侠中，堂弟云中、泽中。青苔铺陈氏家族，是一个较大的家族，最多时八十三口人，四世同堂，和睦相处。

他连捷进士后，任职户部，四品衔，协同翁同龢执掌财政，深得翁信任，依为左右手。翁为维新派，咸丰状元，当过同治帝、光绪帝的师付，一八八六年从军机大臣调任户部尚书。陈宗劬“供

职户部，管北档房，受知翁大司农，倚若左右手”

（续修东阿县志卷十四）。在掌管全国财政期间，克己奉公，兢兢业业，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于度支大政，利弊所关，犯彥抗诤，词不尽不止”

（续修县志）。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民经济收支计划，能从大局出发，统筹考虑，决不奴彥婢膝，一味盲从。一八八九年，帝国主义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率皇亲国戚逃亡长安，他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北京，坚守岗位，“出都门一步非死所也”（续修县志）。联军进北京后，“昼则枪弹横飞，持械榕索，夜则烽燹射目，众声沸腾。谣言百出，顷刻数惊，变态靡常，祸机莫测，虽强毅有守者，未免色然骇矣。农部在松树胡同原寓，安处如恒，昕夕过从，谈笑无异平日，非志贞于素，焉能无是，其不去可及也，其从容不可及也”（李步沅《送陈农部宗劬赴长安诗》序），同年十一月，奉召赴长安面君。当时慈禧和各大臣，正为找不到赋税及财政征收册籍作难，陈宗

幼到长安后，奉上了他们急需的档案材料，深得皇上赏识，“仁和相国奏对谓天下财政在陈部郎一人胸中”（续修县志）。于是升授左丞，晋爵二品。命其考察日本财政，查核各省大清银行。回家后去上海银行巡察，各省财政均送上海集中。这时，不少管财政的官吏，纷纷赠送金银珠宝，以买欢心，请其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保其官运亨通。当时，确是陈发财的大好时机。然他拒不受，一尘不染，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廉洁清高。

在京任职期间，生活简朴行为端庄。既未纳宠收妾，也没中饱私囊。每年要家人给他做两双布底鞋捎去，表示不忘过去的生活艰难。回故乡探亲时，车马轿骑到大刘时，（离青苔铺约二里）都是弃轿步行进村，以一个平民的身份，走在乡间的土道上，和家乡父老，亲切相见和攀谈。既不显示其衣锦还乡的荣耀，也不摆他当官为宦的架子。他把节省下的俸禄，给本村盖起了一座小

学。辛亥革命后在北京将自己的私蓄数万元捐赠给了国家财政学堂，自己过着布衣粗食的清淡日子。不盖房子不置地，有钱时买书、藏书。八十三口人家，不足三百亩地。有次，他管家的侄子进京找他要钱，准备买些田产。他问侄子：“你现在每天吃几顿饭？”其侄答曰：“吃三顿”。他笑着说：“还买地干啥？有三顿饭吃就行，你还准备吃四顿吗？”结果分文没给。他还告诉家里，要怜恤穷人。他家的柴草垛，常年放着三齿，不要人看护，本村和邻村穷人没烧的时，可以随便去取。

四个女儿，却都嫁给了豪门贵族。大女儿嫁到东平古台寺郑家，二女儿嫁东平禹村侯家，都挂过千顷牌。三女儿嫁聊城倪官屯姜家，四女儿嫁聊城孙堂孙家。他们都是贪图陈家的功名，拥有土地都比这里多若干倍。大女儿东平郑家，是东平有名的八大家之一，挂过双千顷牌，看不起陈家。女儿回娘家省亲回婆家时，叫谁去送客谁

不去，怕遭到郑家白眼。陈宗妣决定自己去一次。到东平后，和他亲家翁各乘车进城，他亲家沿途指着他家的山林土地夸富，进城后看到街两旁的店铺，又说某某店铺是他的，某某字号也姓郑。他心中有些讨厌，想教训他一下。双双驱车到东平州衙门，送上名片后，他们都进了一道门。到二道门时，他亲家被挡在门外，陈一人被州官迎了进去。招待完后又过了一个时辰，陈告辞时，州官亲送出州衙上轿车，再三顶礼膜拜。他亲家却被冷落异常，且挨了一顿饿。在回去的路上，他亲家态度大变，才深深觉得土鳖财主进不得官府衙门，还是陈亲家官高名大吃的开。打那以后，再不敢轻视了。

他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财产，只留下三屋子书。他死后分家时，安了十五口锅，有的只分了四亩地。一九四七年土改时，只有他一个孙子被划为地主（有八十亩地），其余为中农和贫农。他大孙子陈文林，大学毕业后，曾在安徽当

过法官，现仍在京居住，年届八十。其后代，抗日战争时期，不少人参加了革命，现散居各地。

可惜他的藏书和遗墨，十年浩劫中付之以炬。他的坟墓也在极左路线下被平掉。这是我县文化遗产极大的一笔损失。

金乡李步沅有诗赞曰：妖气迷四塞，寇虏逼京华。蓦地惊烽火，轰天走炮车。见危期受命，报国久忘家。雷雨棲真性，萧然静不华。

早岁通朝籍，清声冠版曹。度支新厩绌，厘剔倍贤劳。硕画资枢府，时艰重轭曹。料应酬大局，不贵察秋毫。

## 隋建《曹植墓神道碑》小记

刘玉新

曹植墓神道碑，在今山东省东阿县鱼山西麓，曹植墓北侧。该碑亦称《曹子建墓碑》或《陈思王庙碑》（见《中国名胜词典》第六百四十五页《曹子

建墓碑》条)，是隋开皇十三年（593）为已故魏东阿王曹植修建的。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的四子，曹丕的胞弟。他是建安时期杰出的诗人，才高八斗，七步成章。词彩华丽，骨气奇高，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他曾于魏太和三年（229）封为东阿王，食户三千，历时四载。太和六年（232）二月改徙陈王（今河南省淮阳），是年十一月病逝。死谥“思”，故又称陈思王。《三国志陈思王植传》载：“初，植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遂营为墓”。太和七年（233）三月，其子曹志遵遗嘱，将其遗体迁葬于鱼山西麓。该墓一千七百多年来，历经沧桑，频遭劫难，损坏严重，但其墓左的神道碑却侥幸保存下来，并且基本完好。这不失为我国铭刻艺术中的一件珍品。

该碑通高二百五十七厘米，宽一百零三厘米，厚二十一厘米。碑顶呈半圆形，石料较粗，为灰白色岩石质，有额无题字，但在碑首正中粗镂造

像。造像为三尊，一主二仆，正与该碑文中记述“遂雕镂真容，镌金写状”吻合。因年代久远，造像面容形状已毁，只剩残迹。额背浅雕盘龙，尚清晰可辨。碑篆隶杂用正书，文二十二行，行四十三、四十二字不等。共是九百三十一字。漫漶脱落五十七字，现存八百七十四字。无撰书者姓名。现将碑文抄录如下：

王|诤|植字子建沛国谯人也洪源|与|九|泉|竞|深  
崇|塞|与|三|山|比峻自|权|舆|名|胜|乃昌冥焉其|后|建  
国开基|左|右|周室显霸业于东都彰茅封于谯邑琼  
根宝叶蔚芳。

兰如莫朽轩|冕|相传裘缙绅而不绝此乃备颁典  
册聊可梗槩而言矣逮承(丞)相参迺成王室道熏(勋)  
隆重位登上宰受国平阳自|兹|厥后鸣鸾佩玉飞盖  
交映祖嵩汉司隶太尉公职掌三事从容论道美著阿  
衡之任不亦宜乎父操魏|太|祖武皇帝资神龙虎剖判  
□以开基名颁讖牒谣敞真人火运告终土德承历爰  
据图录享有天下骤改质文驰迁正朔英雄之气概有

徐矣昆丕魏高祖文皇帝绍即四海光泽五都负宸明  
堂朝宗万国允文允武庶绩咸熙正践升平时称宁晏  
致黄龙表瑞验兆漳滨玉虎金鸡恒纶宇窳王乃黄内  
通理温淑含英濬哲稟於自然博愍由于天纵佩金华  
以迈四气抱玉藻如忽风霜缀瞻藻于孩年掇首仆于  
孺岁寻声制赋膺诏题诗词彩照灼子云遥惭於吐  
凤文华理富仲舒远愧于怀龙又能诵万卷于三冬观  
千言于一见才比山藪思并江湖清词苑苑若聚葩之  
蔚邓林绿藻妍妍如河英之照巨海五库太官之誉握  
促之器者也但祿由德赏频享皇爵建安十六年封平  
原侯十九年改封临淄侯都不以贵任为怀直置清雅  
自得常闲步文籍偃仰琴书朝览百篇夕存吐握使高  
据擅名之士侍宴于西园振藻独步之才陪游於东阁  
黄初二年奸臣谤奏遂贬爵为安乡侯三年进立为王  
及京师面陈滥谤之罪诏令国国自以怀正信而见  
疑抱利器而无用每怀怨慨频启频奏四年改封东  
阿王□年以陈前四县封复封为陈王以谗言数构  
奸臣内兴十一年里频□徙都汲汲无欢遂发愤而

薨时年[卅]有一[卽]管墓鱼山傍羊茂台平生游陟有  
 终焉之所（志）既如年代夙远兆莹崩沦茂响英  
 声远而不绝至十一世孙曹永洛等去壘朝皇建二年  
 蒙前尊孝照（昭）皇帝恢弘古典敬立二王崇奏三  
 洛永洛等於时膺符表贡而奉照（昭）皇亲训圣诏  
 比经穷讨皆存实录蒙勅报允兴复灵庙馈嗣蒸尝四  
 时虔谒使恭恭嗣子得展衷诚之愿梵梵孝孙长毕昊  
 天之慕遂镌镂真容镌金写状庶使休休相度永劫  
 而不泯七步文宗传芳猷于万叶者也其词粵（曰）  
 惟王磐石斯固缔绪攸长波连溟渤枝带扶桑分珪  
 作瑞建国开疆□楼苗阁远迈灵光基器调高奇风  
 华（格）梳（疏）朗谈人刮舌灵蛇曜掌东阁晨  
 开西园夜赏松华桂茂玉润金响基声驰天下道冠  
 生民才惊旷古德重千钧混之不浊磨而不磷如何  
 一旦萎我哲人墓山舟易失日车难驻一谢人间长  
 遵诞路风哀松柏坟穿狐兔何世何年还成七步基  
 迺考惟昆廓定洪基受图膺历运合紫微一辞皇阙  
 永背象掬风随百转乡逐云飞墓大隋开皇十三

年岁次□□□□

（注：碑文中□的字为参照《东阿县志曹子建墓道碑》文填补的，以便研读全貌。（ ）内的字为纠正部分谬误。）

从以上碑文的内容看，详略有度，剪裁得体，记载了曹植的籍贯、家世、封爵、官职及生平经历，并对其品性、慧智及博学之才作了高度评价，如

“王乃黄内通理、温淑含英，潜哲稟于自然，博愍由于天纵；佩金华以迈四气，抱玉藻如忽风霜；缀贍藻于孩年，摄酋仆于孺岁；寻声制赋，膺诏题诗，词彩照灼……又能诵万卷于三冬，观千言于一见，才比山藪，思并江湖，清词苑苑，若聚葩之蔚，邓林绿藻，频频如河英之照；巨海五库太官之誉，握促之器者也……”

并对曹植改封临淄侯后，遭贬之前，安居邺下的一段公子文人生活作了详尽的描述：

“不以贵任为怀，直置清雅自得，常闲步文

籍，偃仰琴书，朝览百篇，夕存吐握，使高据擅名之士，侍宴于西园；振藻独步之才，陪游于东阁。”这些文字活灵活现的描绘出一幅曹植邺下文学生涯鸟瞰图。

该碑文对于曹植研究有着一定的佐证参考价值。不失为一篇较好的记述曹植生平事迹的传记文章。只是文中有几处谬误，如“四年改封东阿王，五年以陈四县封”应为（太和）三年……六年……（见《三国志·陈思王传》）又如“……遂发疾薨，时年三十有一”应为“…时年四十有一”（见本传）等等。望同志们研读时注意校正。

从该碑的文字角度上看，正如有些史料记载的那样“篆隶八分，甚古”（《太安府志》）“正书兼用篆书”（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该碑中篆字约有四十一个，其余汉隶多于正楷。并且有的篆隶相杂，有的隶楷不分。粗看起来参差不齐，庞杂紊乱，但仔细观赏，却发现其浑然一体，暗含神韵。那种自然浑朴、圆转遒劲的笔力，给人

以美的享受。使我们从中看出中国书法自古以来就有其极高的浑然质朴的美学价值和力度较深的造诣。这不但是我们中国书法艺术的继承由篆隶向正书演变之过程，又是汉字历史沿革演变之见证。这是汉字专家及书法爱好者不可多得的研究参考资料。

该碑铭具有对曹植生平和文字书法研究方面的价值，多不为世人所见，因此，更有必要对此历史文化遗产妥为保护。

据《东阿县志》（清道光九年本）记载：该碑“开皇十三年立在县西八里鱼山东阿王墓侧王士禎云书法杂用篆隶八分甚古考欧集古录赵金石录及金藏琳琅石墨镌金华石志俱失载……碑高七尺残缺十余字余具完好如故相传国朝（清）土人自大清河内捞出故历代失载”

《泰安府志》记载“此碑王士禎云书法杂用篆隶八分甚古清朝土人自大清河中捞出故历代失载。”

光绪二十五年（1900）所建《重修陈思王碑楼记》中载“阿邑吾山（即鱼山）西麓陈思王墓侧有隋开皇十三年所建神道碑撰文书丹名俱不传文详泰郡府志又载谷城邑乘字体奇异更传颂古今先儒王士禛云书法杂用篆隶八分甚古考欧集古录赵金石录及金藏琳琅石墨鐫金华石志虽俱失载书法可羨……”

《中国名胜词典》中记载“碑为隋开皇十三年（593）建高一·七米（有误，应为二·五七米）宽一·一米（应为一·〇三米）有额无题字，似有画像，已不可辨。碑文二十二行，行四十三字，正书兼用篆隶，表现出我国书法由隶向楷过渡的特征。碑早年湮没在大清河中，至清代始捞出，还置墓前，并建碑楼保护。”

从以上记载看，该碑自隋建之后，历代失载，至清初才为人所识至于记载中该碑曾湮没于大清河（即今黄河）中，尚有疑窦。该碑在鱼山西麓曹植墓侧，而大清河在山的东侧，偌大一块石碑，

它是怎样掉入大清河中的呢？是不是建碑时，从水路运至鱼山掉入大清河，还是鱼山“频经洪水，地基塌陷，墙壁崩裂，碑将有险”（《重修陈思王碑楼记》）而被逆流冲入大清河？不得而知，亦无详载，有待考究。总之该碑流传较晚，清以前，湮没不彰，这是有据可查的。

今人多有记述此碑者，但大都是见到此碑拓片或有关资料而言的至于真正对此碑做一全面考究论述者，至今尚未发现。对此碑进行全面考察，这对于研究曹植的生平事迹，对于研究中国文字书法由篆向楷的演变，都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因此，笔者根据自己几年来在文物考古工作中发现并掌握的部分隋碑资料、数据作此小记，以供研究参证。作一引玉之砖。

## “娃娃县令”尹子奇

周长凯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476—221年）地处齐国西南重镇阿城（东阿县古城所在地），一连接换了七个地方官，都没有把阿城治理好。那里连年兵荒马乱，匪患无穷，再加上魏国经常越境来这里抢劫民财，使黎民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可愁坏了齐宣王，几经周折，他看上了年方一十八岁的尹子奇。准备叫他到阿城当邑宰（即后来的县令）。一天，尹子奇被招进宫中考问：“治理天下的根本和要领在哪里呢？”

尹子奇很有卓识的答曰：“君主任用官吏，不徇私情，只有贤人才亲信。经常关心政事，不断考查功臣，赏赐只限于有功劳的人，刑罚只限于有罪的人。使政治平正，人民安乐，所有的人

各得其所。天地自然会顺从我而正常，祥瑞自然会响应而汇集，凶灾自然就会离开我们而消灭。如果君主任用官吏，不是亲属，就是私宠的人，喜爱的不是美女就是专功拍马的人，跟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就当作好人，跟自己意见不同的就当作坏人，高兴的时候就随便奖赏，发怒的时候就乱用刑罚。一天到晚只有玩弄美女，把政事丢开不管，老百姓受到冤枉残害。就是四季风调雨顺，地里也长不出好的庄稼来，社会也不会安宁，失败、乱亡就不可避免的到來。反之就会振兴和发展。”

尹子奇的政见，齐宣王很为赞赏，事隔不久尹子奇就走马上任了。可是上任不到三天，朝内就议论纷纷，接连奏本：“阿城一向很难治理，大王想必知道，尹子奇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毛孩子，俗话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若是弄出差错，可就不好收拾了。”奏本的大臣接二连三，宣王听了觉得自己的旨意不够慎重，赶忙派使者把尹子

奇追回。

使者是一位中年人，能文善武。当他追上尹子奇时大吃一惊，调转马头急忙回朝向宣王禀报：“我见到子奇已邀请了五、六个须发斑白的老人同车赶路，老年人有智谋，年轻人有朝气，办事果断，这两者结合起来，集思广益，一定能把阿城治理好。”宣王听了表示赞同。

子奇到阿城上任后，总结了前任县令没有治好阿城的教训，又遵照老人的参议，先是整治民风，除匪患安民心，同时到各地查访民情。救济穷苦百姓，招贤纳士，共商治阿大计。因此，生产和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阿城出现了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象。

与阿城毗邻的魏国，听说派了一个娃娃当县令，便派兵来攻打，想吞掉阿城，蚕食齐国领土。尹子奇发动全县百姓拿起刀枪，奋起抗敌，直杀得魏兵尸横遍野，亡魂丧胆，狼狈溃逃。

这一消息象长了翅膀，很快传开了。齐国人

民称赞尹子奇。齐宣王便传旨给这位“娃娃县令”记一大功，官升三级。东阿县志有记载，人民千古传颂。这正是：

“娃娃”当县令，  
治阿有奇功。  
江山代有人才出，  
千秋历史留美名。

## 铜 城 夜 谭

鲁 莽

太阳落下了西山，月亮还没爬上枝头。铜城朦胧在夜幕的轻纱里。天空繁星点点，路旁茂树森森。一切都涂上了夏夜的神密色彩。

往日商店霓虹灯和马路水银灯下，打扑克来象棋的人群不见了，逛马路、下酒馆的红男绿女，也明显减少。三三两两的人群，象被什么吸引着，流向了文化广场。我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向广

场走去。

广场确实是夏夜纳凉的好地方，宽敞、洁净。清风徐来，沁人肺腑。人们采取各种自由的姿势，或坐、或立、或卧，边纳凉、边听一位老者讲故事。

纳凉晚会上，不少青年提出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问题，要求解答。在众多的问题中，包罗万象，内容广泛。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几乎都牵扯到了。但又都是和东阿这块土地有关。笔者自始至终也都参加了旁听，觉得有些带共性的问题，值得全县人民共同了解。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没有历史和文化的民族，是可悲的。这对于推动我县精神文明建设，能起到些微的推动作用吧！

这些问题和解答，象一个个通俗小故事，可以自成篇章，也可串连成册。因为是在铜城夏夜漫谈辑录，也来个“东施效颦”，步《天方夜谭》后尘，姑且取名为《铜城夜谭》，奉献给大家。

## 一、关于铜城的传说

铜城镇，是当今东阿县城。这个城镇，居南北两京要津，有所谓驿马传书穿城而过。是明清王公大臣进京外巡必经之地。春秋时属齐地，汉时为临邑县县城所在地，曰马防城。南北朝时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公元420年）立东魏郡，初设治马防城，后迁治台县城。金时，（公元1115年—1234年）始改名桐城镇。明、清两朝，南北交通驿道，在北门外设有驿站，乃洪武二年（1369年）知县黄哲所建。驿者，古时供应递送公文书信的人及官员往来住宿、换马处所。那时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一切靠人马传送，象现在的接力跑一样。战国时叫邮驿，汉叫传舍，唐从陆路扩大到水路，增设水驿。宋时每十至二十里设一邮铺，驿道上设马递铺。元驿传叫“站赤”，规模更大，可供欧亚两洲交通。明设驿站及递运所。清废递运所仍设驿站。改差役为雇役，直到清末邮局产生后，始取消驿站。铜城镇，过去也叫铜城驿。民国时是四区所在地，四七年东阿县人民

政府迁治于此。后虽有在东合并迁治之举，但复县后，县城仍设于此。

这里北魏时即“城周八里，雉堞楼櫓，居然重镇”（旧志语）。以后几代，又屡加修筑，规模更加扩大，城墙、护城河、四门至今遗址尚存。有人问到，民间流传的“拳不打铜城”是怎么回事？现在简单的谈谈。

过去达官贵人，行商富贾，为了旅途安全，常雇用武艺高强的人，保护人身及财务安全。被雇用的会武术的人称做保镖。一般保镖，都象旧戏舞台上的武生打扮，身穿紧身衣裤，佩短刀棍棒，怀揣袖箭、弹石、飞镖。每到一处关隘，先吹嘘一下自己的武艺如何高强，以震慑绿林强人，避免劫持，这叫喊镖。如果确确实实的武林高手做保镖，只要这一通报名姓，剪路的也就自忖抵挡不住，退避三舍，把他们让过去。过去两京设有镖局，是职业性行业。新中国建立时，镖局取消。目前，在经济特区深圳和开放城市大连等，设有

保安服务公司，类似民间镖局。

我们这里，一向有尚武风俗，历代出过不少豪杰英雄，历史上有名的几次农民运动，都曾在这一带发起。如瓦岗寨和梁山泊聚义、黑旗军、捻军、义和拳等。过去，铜城居民，人人都会武术，用以保家安身。少林拳、八挂掌等拳术，几乎人人都会。

清仁宗（嘉庆）年间，有一保镖，护卫着一批商贾从南京往北京，路过铜城。到这里时已日落西山，保镖人在昏暗的夜色中，口出狂言喊镖，惹恼了铜城拳师秦立业，出来挡道比武。车辆人等，不得前行。就在南门外的空地上拉开了战场。先比拳术、棍术，保镖人节节败退。后来保镖者投出暗器柳叶飞刀，被秦立业一一躲过。保镖人举起混铁棍一棍劈头打来，他跳出圈外，回家也取了一件兵器，再来厮杀。经过几十回合，保镖人被弄的满身血迹，跪地求饶。秦立业也就适可而止。觉得干镖行的，也都是图混饭吃的穷人。

拱拱手回到家去。保镖人疼痛难忍，羞愧难言，带着他这一帮人马，趁着月黑人静，悄悄的绕铜城东边小路北去。

到京城后，和他的镖行朋友谈了这件事，并绘声绘形的盛赞铜城人拳术高超，武器优良。其实，哪里是什么武器，是他那天去地里抻枣树回来，把枣疙针用麻绳捆在扁担上，临时做了武器。夜里天黑，对方看不清，枣疙针又有弹性，他用铁棍越用力抵挡，被抽扎的越厉害。产生了以柔克刚的效果。抡动中，还发出呼呼风响，这更增添了神秘色彩。乃至传到京师，就变成了神话。以后，凡有保镖者再经过铜城，不再喊镖，悄悄穿过。民间就流传开了“拳不打铜城”的传说。铜城的意思是坚固如铜墙铁壁，是指城墙，还是指人的武术，恐怕兼而有之。原为“桐城”，后改为“铜城”。正史无载，无资料可查。按逻辑推理，铜城名称的确定，当在清朝。

铜城有七十二面琉璃井，三十二个死胡同。

这是人们一向津津乐道的。为抵御金兵侵犯，巧摆八卦阵，构筑了三十二个死胡同，如今，死胡同不见了，琉璃井仍有存在。这些，过去都增加了铜城的坚固观念。一个孤立土丘的古城堡，如果没有充足的水源，是没有战略价值的。马谡失街亭，就是吃了高居山头，而又无水的亏。所谓琉璃井者，乃井筒内生有极厚的碳酸钙结晶和千奇百怪的钟乳石，从上面望下去，闪闪发光，象琉璃一样。这是因为水内含有大量矿物质所造成的。铜城水系也是《水经注》中所说的“济水一股地下潜流”。含矿物质多，水比重为1·0038，超出常水，故多溶岩积物，遍长青苔。从琉璃井，也可看出此镇的年代久远。目前东阿酒厂的“曹植醉”、“铜泉特曲”、“铜泉佳酿”、“琉璃井”、“阿胶酒”等各类酒，突出了地方特色。色、香、味兼而有之，深受人们欢迎。

## 二、封建科举取士漫谈

有的青年朋友，问到家乡的碑文上，有的写

贡生、监生、太学生；有的写翰林、秀才、举人；古戏剧中，也经常提到“进京赶考”、“金榜题名”，究竟是怎么回事？过去几乎每县都有文庙，是做什么用的。这些问题，归纳到一起，就是对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不明白，现在简略的谈一下。

过去选拔人才，也和当今一样，都是采取考试制度。现在的学制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要经过三次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隋以前，选拔人才是以皇帝个人的喜怒爱好为标准，没有一定的准则。春秋战国时，以说客形式出现，重在口头阐述。分封王公，任命官吏，多是皇亲国戚。平民百姓中的有才之辈，大都老死草莽，无从施展。到了汉末刘玄德三顾茅庐，诸葛亮被重用时，也是隆中一席答对，使先帝如鱼得水。三国时期，虽是群才竞出，不拘门弟，但终究没有一定的取才制度。到了唐朝，才有了由皇帝临时设置的考试，用以收罗天下才人。后来，进一步完善，确立了开科取士制度，由吏部

对学士和乡贡进行考试，并规定了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最受考生欢迎的是明经和进士两科，进士科考诗赋，取士约千分之一。这是唐诗兴盛的主要原因。除去开科考试以外，由皇帝临时下诏，对有名望的屡试不中的才人，推荐进行考试。也选拔了一批人才。如李白、李贺、骆宾王、孟浩然等。这种不论门第，不拘泥考试选才方法，是根据真实本领，量才使用，因而使唐代出现了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兴盛时期。屡试不中的李太白，能使国舅杨国忠磨墨，太尉高力士脱靴，与这种尊贤爱才的社会风气，是有极大关系的。

宋朝赵光义确定殿试制度，考生被礼部取中后，再到内殿复试。假如礼部考官弄假，殿试要落榜的。殿试第一名谓状元。一〇六四年英宗赵曙定为三年一试。被录取的进士称三甲。一甲谓进士及第，二甲为进士出身，三甲谓同进士出身。大试头年秋季，各州县选取的人才，于冬季到京

师集结于礼部，到次年春季开考，被录取的人，列名放榜给尚书省，进入仕途。为了防止舞弊，宋时即对学生文卷采取“弥封”、“誊录”之法。以后各代相袭，逐步完善。清朝康熙皇帝，更特别重视考试，曾亲自出题、阅卷，对国治民安，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一般分六级。即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各州县生员，按朝廷规定，每年二月集中到县考棚应试，分五场进行，即主场、初试、再试、复试、连复试。录取各生曰童生，再投考府试。县试第一名谓县案首，相当于目前我县的初选。府试即当今地区一级考试，各府所属州县童生于每年四月，齐集府城，由知府主考，分两场进行，一场为主场较严。录取者可再考一场。第一名曰府案首。院试相当于目前省一级的考试，由省学台主考，三年举行一次。凡府试取中的均可参加院试，录取时没有名额限制，合格即取。院试分五场进行，即

经古、复试、正场、提复、大复。被录取者，可入府学、县学读书，称学生员，第一名曰院案首。基层考试除上述三种外，还有童试。童试是考取秀才，各州县未取得功名的儒生，都可参加考试，不受年龄限制。分三场进行，被录取的士子曰生员，可以进府台、县学读书，以应高一级考试，俗称中了秀才。秀才、庠生、茂才，都是对生员的称呼。秀才必须年年参加府、县岁考，成绩分六等评定，有附生、增生、廩生、常生等之分，秀才中经考试补的廩生、常生，由政府发给膳食。

乡试每三年一次，子、卯、午、酉之年进行，在各省省会贡院考试，在应考之年八月举行。分三场，从八月初九到十五，三天一场。九月放榜，谓桂榜，被录取的叫举人，又叫孝廉。由朝廷亲自派出主副考官，十八房同考官分房阅卷，各省巡抚或总监作监临。此次考试即中举，头五名曰五魁，其第一名曰解元。经府、县岁考取中的秀才（即举子）才能参加乡试，乡试之年即古戏中

所说的大比之年。中举后即可出任知县或府、县学官。正常乡试为正科，因皇帝大庆临时开考称恩科。

会试明清规定三年一次，丑、辰、未、午之年举行。在京师礼部考试，从三月初九到十五日，分三场进行，四月十五日发榜。应试的是各省举人，取中的曰贡士，第一名谓“会元”。考试时由皇帝亲派得力大臣为总裁，会同十八名同考官共同负责考试、评卷。有的同学问到，康有为上书光绪变法时，为什么叫“公车”上书。这里简单谈一下。清朝为了优待远道进京赴考的举人，允许他们免费乘坐公家设置的驿马、驿车，所以应考的举人又叫“公车”。康有为是广东省举人，他所联合上书变法的人，也都是举人，“公车上书”，即举人给皇帝写建议，提出变法主张，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康有为等在客店雇车去见光绪帝。

殿试又称廷试，是科举制中最高的一次考试。

宋代后确立。应试的人都是贡士，由皇帝派亲王大臣监考，派公正廉明的大学士及部院大臣评阅试卷，被取中的人曰进士。一甲（即一等）三人曰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曰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曰同赐进士出身。进士参加朝考后，第一名曰状元，第二名曰榜眼，第三名曰探花。考取进士后，即授于官职。明时三月考，清乾隆时，始规定四月二十一日举行殿试，和会试同年举行。录取人数约为应试人的百分之一。我县青苔铺陈宗媂，即为光绪庚辰科进士，官二品，掌财政。豆营周天爵嘉庆辛未科进士，官安徽巡抚。

有些才人，经过上述一系列考试，大都高榜得中，但也有由于讨厌八股取士，或才高气盛，不屑于奔走投考，抑或榜上虽无名，胸中确有实学。为了不埋没这一部分人，清朝规定每十二年，由各省推荐本省风流名士，保送进京，经朝考合格，就成为拔贡，可以做知县等官。拔贡的声望，高于一般举人，为当时风流才子和名士。我县王善

泽即同治壬戌（1862年）拔贡。去年烟台地区也有一高考落榜品学兼优学生，而且有不少发明创造，被推荐进了山东大学，即类似过去的拔贡。

为了鼓励各市、县生员，学习奋进，他们必须年年参加岁考，秀才中成绩较好的人，可以成廩生，叫补廩，由国家供给衣膳。

我县较多的是监生。不少农村的墓碑上刻有监生名衔。其实监生者，是明、清两代指尚未进学的生员，他们虽未进学，但已具备了进学的条件。他们有的参加岁考，有的县官或名人保举，有的虽是白丁但有点钱，也可以花钱买，经皇帝或有关人员特许，这叫捐监。监生是出仕做官的第一个条件，没有监生出身，是不能做官的。捐监，就和当前有些人花钱买文凭一样，都是名实不符，沽名钓誉之举。对国家毫无益处。

我们今天的考试制度，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为了使其更加合理又在改革。目的是不埋没一个人才。学生，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取得

好成绩。靠走后门或其它办法，都是自欺欺人，为后世所不齿。

### 三、广粮门村名的由来

有人问，广粮门是怎样得名的？现扼要谈谈。

广粮门的奠基人赵得和，在明朝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从山东青州府（今益都）乐安县（今之广饶）迁东阿马曹集落户。当时这里人烟稀少，土地广阔，赵氏勤俭持家，辛勤耕作。经过四十余年奋斗，家道兴盛，藏粮数万。立村五十一年，适逢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八年（1443年）大灾荒，赤地千里，饿莩遍野。赵得和目睹人民惨景，自动捐赠豆谷七千五百石，交县官赈济一州五县贫民，使不少人于垂危中得救，度过灾荒。后来县、府官吏，奏闻进京，英宗勅旌义民。他又将白麻二千，进贡皇上，被封为户部员外郎，为其建广粮门牌坊一座，“赐御制旌言勅石，永示褒奖”（续修县志）。

户部乃唐朝设置的六部之一，掌管全国土地、

户籍、赋税、财政收支，长官为户部尚书。宋、元、明、清继唐沿用至清末，始取消户部称谓，将民政、财政分设。财政部曰度支部，我县陈宗劬掌管财政部时，称陈度支。员外郎是封建王朝的一个官名，原指设于正额以外的郎官。晋时指员外散骑侍郎（皇帝近侍郎）隋于各尚书省增设员外郎，为各司之次官。唐、宋、明、清相沿。但员外郎官衔，有实虚之分有的有职有权，有的只是名义上为官，实际上并不到任，多为嘉奖虚封。赵得和因捐粮献麻有功，被封员外郎，看来只是名义上的官衔，从碑文上的圣旨，可以看出。受封圣旨原文如下：“圣旨勅山东兖州府东阿县赵得和国家施仁养民为先尔能出豆谷七千五百石用助赈济有司以闻朕用嘉之今特赐勅奖谕劳以羊酒旌为义民仍免本户杂派差役四年尚允蹈忠厚表励乡俗用付朝廷褒嘉之意钦哉故勅。”

赵得和所建村庄马曹集，于广粮门牌坊建起后，改村名为广粮门沿用至今，已有五百年历史。

看来，凡是做过有益于人民的事的人，有爱国爱乡之举，历史上都会给予记载，人民也有口皆碑，历代不忘。当官要当清官，为民要做义民。当前我县，有不少人勤劳致富后，不忘国家和集体，捐赠巨款，为国家解忧，为他人谋福，办教育，兴义学，这种爱国爱乡行为，也将名垂青史，流芳后世。

#### 四、民俗初探——过节

有人问，我县人民过的几个大节，是怎样来的，有何意义，有何习俗。现作一初探。

东阿民间普遍过的是春节、仲秋节、端午节、清明节。其中最隆重的是春节，规模大，时间长。它的序节有腊八、辞灶；它的尾节有元宵节、二月二。

春节是指夏历（建寅历）正月初一。民间谓之过大年。为了和公历新年区别，有的叫旧历年，有的叫春节。

春节起于夏。前一天叫除夕。除夕之日，家家摆供品，炸年货，包水饺。人们为了纪念去世

的亲人，到坟上招请魂灵回家过节。家中要挂族谱，上写世系宗亲。有的还供灵牌，男的曰显考，女的曰先妣。家家还贴春联，上写吉利或奋进的话语，讲究平仄格对，又叫对子。解放前，贴门神。一般北屋贴五子登科版画，东西屋媳妇住房贴麒麟送子版画，大门则贴两个拿兵器的武将，有的说是锺馗，有的说是神荼和郁垒，还有的说是把守天宫南门的哼哈二将。总之是表示吉庆，祛邪，不让妖魔鬼怪进宅。除夕之夜要守岁，一般过子时，表示旧的一年结束，新的一年开始。吃过辞岁饺子，晚辈向长辈叩头，长辈给孩子们分钱，叫压岁钱。

正月初一拂晓，开始拜年，先家内、族内，然后到族外及全村。拜年除恭贺新年以外，还有抛弃前嫌，重新和好之意。据说，平时不和，互不上门的，只要这天互相拜年，就一切仇恨俱消，重新和好。这是民间调解纠纷的好办法。文革时当四旧破除，近年又开始恢复这个传统习俗。

春节这天，男女老幼都穿新衣，戴新帽，吃饺子，放鞭炮。人们的欢乐情绪最高。饺子古时叫馄饨，我县有的叫扁食，有的叫脚子。是我县民间高级食品。据说唐朝时，已传到西域，明朝中叶成为我国春节美食。因其形同元宝，有招财进宝之意。我县人民明时从山西或山东沿海迁来时，已有食饺子的风俗。只是当时饺子馄饨不分，到清朝才有明显区别。饺子味美、形佳，极易做。而且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因其皮包馅密封，煮时内里产生气体温度高，类似一个小型高压锅，保其鲜嫩与营养素。目前，我国水饺大量出口，深受世界各国欢迎。这是中华民族应自豪的。

初二日到十四日，是走亲访友的日子，也叫拜年。一般是走丈人家，大人孩子都去，携带礼品，县南部为猪肉和点心，县北部为点心馒头。十里地不同俗，各有各的理由。初三后一般是姥娘家，姑姨家或一些常年不走动的老亲戚家和朋友家。回来时一般押回一块用大枣白面做的糕来。

没过三年的新女婿，去丈人家时特别隆重，要找有名望的长辈陪客，而且新女婿要坐上面，回来时押的糕逐年加大直到三年，三年糕有的大到近百斤。意取早生贵子，年年高升。

进入腊月后，人们即忙着筹备过春节事宜。商家忙于结账讨债，穷人疲于躲债藏匿。到了腊月初八，都熬腊八粥，有的施饭，有的自食。腊八原为佛教节日，是释迦牟尼成道日，佛寺常于该日诵经，并效法佛成道前牧女献乳糜的故事，取香谷及果实成粥供佛。汉代后以冬至后三戌为腊日。《说文》载：“腊祭百神”。《荆楚岁时记》：

“十二月初八日为腊八”。后传为我县民俗，十二月初八日，要吃腊八粥。主要是用粘米、大枣、红小豆做成，香甜可口，有庆丰收之意。我县过去还有把腊八日，做为女孩扎耳孔的日子。因腊八正是隆冬盛寒之时，清早将女孩骗至村外看花大姐，经过冷冻，耳朵麻木，回去后即用针穿刺耳垂，并拴一线，以免长合。数日后抽去线，即

有耳孔，可戴耳坠、耳环。解放后，随着妇女的解放，此俗随废。近几年，穿耳孔戴耳环之风又兴，然这是摩登女郎赶时髦，自动找医生扎孔，也并不是腊八进行。

腊月二十三是祭灶日。过去人们迷信，认为灶王爷主宰一家福祸，因此家家灶头供灶君。《礼记·礼器》孔颖达疏：“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抱朴子·微旨》：“月晦之夜。灶神亦上白人之罪。”人们为了使其“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于这天晚上祭灶。祭灶时除烧纸人纸马供品外，还供麦芽糖做的糖瓜意即灶君吃了它，把嘴粘住了，有坏话也讲不出。祭灶之举，有点象现在的行贿。受贿者，吃人口短，往往好替人说情、撒谎。

辞灶这天，家家打扫卫生，刷洗炊具，准备蒸制过节用的食品。这一日也是全家团圆日。过去在外经商的，抗活的，教书的，逃债的于辞灶日都回到自己的家。讨债的于这天也停止再讨。

表示让大家都欢欢喜喜过个年。

正月十五元宵节，乡间叫小年，始于周。唐代以来，元宵有观灯之举，所以又叫灯节。过去人们为了庆祝新的一年月圆家圆，这天晚上吃元宵。因我县过去糯米困难，大都吃水饺。晚上家家上灯，有的点蜡烛，有的用萝卜或地瓜挖个灯，置上油、捻。有条件的村，还要唱村戏、玩龙灯、花船、高跷。平时妇女受封建礼教束缚，大门不出，二门不到，但在元宵节，可自由出去观灯，看杂耍，曾有不少风流韵事发生。欧阳修的元宵诗，就是元宵节青年男女幽会谈情的写照：“去年元月夜，灯市花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月夜，月与灯依旧，不见旧时人，泪湿沾衫袖。”

十五过去，十六日送家堂。即将请到家来祭祀的祖先，送回安葬地。迷信说法，送时需在傍黑，早了好出少亡人。而胶东一带，都是在初三凌晨送祖宗，送时鞭炮齐鸣，全家男性公民一齐

出动，热闹异常。

至此，新年告一段落，经商的出门，私塾先生也打点开学，官府衙门也开始办公。

二月二，据说是龙抬头的日子。在农历节气表上，处惊蛰、雨水之间。意即冬眠的虫子开始苏醒，雨天出现雷鸣，一切充满生机。别处是否有过此节习俗不知道，我县此民俗何时开始，也无据可查。可民间都挺重视过此节。这天天不亮，家家爆竹竞鸣，并用柴草灰，在院中或室内画个圆圈曰囤，有的还在圈旁用灰画个梯子，表示五谷丰登，囤大无比，需踏梯子上去倒粮。囤心有的放五谷，有的放铜钱。预祝一年大丰收，粮和钱满囤。

除去祈祝丰收外，家家头天晚上炒豆子。俗名叫炒蝎子爪。因为蝎子是人们讨厌的虫类，惊蛰后也将萌动，危害人民。于是人们就在它刚苏醒时，就将它炒死，防患于未然。

炒豆是非常好吃的，不仅孩子欢迎，大人也

当做另嘴。它的制作工艺简单，色、香、味俱佳。方法是节前三、五天，将粒大饱满的豆子选好，泡在冷水中，待涨大后取出晾晒，加上盐或五香面，二月初一下午或晚上，放在锅内炒或油炸。取出后有的还放糖。不仅香脆，而且还有咸甜等味，家家互送或用以招待客人。

清明节在公历的四月五日前后，到这时太阳已达黄经15度，黄河中下游地区，气温在10°C左右。草木萌茂，天气清明。我县有踏青扫墓习俗。据说，清明的前一天是寒食节，为纪念介子推而设。春秋时晋文公出亡十九年，介子推随王伴驾，历尽艰辛。文公复国后，他回家探母，遍封群臣，忘了封他。他和老母隐居绵上（今山西介休东南）山中，文公派人寻找不遇，即放火烧山，留一条道让他外逃。结果大火将山烧光，介子推始终没出来，被火烧死。文公将绵上封地给他曰介山，并将他死的日子，定为寒食节，三天不准动烟火，以作为对介子推的纪念。此一传说，已有二千五百年的历

史。我县民间，在清明踏青，扫墓，做为对前辈和烈士的纪念。诗人杜牧《清明》诗中写道：“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维妙维肖的描绘了扫墓情景与人的心理活动。

过去，清明节时私塾放假，大家闺秀，可出门扫墓、踏青、春游，亦可荡秋千、放风筝。李淖《秦中岁时记》：“上巳（三月三）赐宴初江，都人于江头褉饮，践踏青草，谓之踏青履。”宋吴惟信《苏堤清明纪事》诗：“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生动描写了春游踏青的景象。

秋千者，意即揪着皮绳迁移也，早为千秋，春秋时犬戎族创。初为一根绳子手抓而荡，齐桓公征犬戎带入中原。汉武帝在皇宫祝寿时叫宫女耍绳戏乐，因讳改名秋千。后变为两根绳吊板而荡。唐宋时才推广到民间。我县此俗，清末已绝。

放风筝是清明节青年和儿童喜爱的一项野外

活动。风筝在我国也有两千余年历史。春秋时公输般作木鸢以窥宋城，后改木为纸。五代时李邕在官中以线放鸢，在纸鸢上系竹笛，经风一吹，声如古筝鸣响，因名风筝，明清盛行。我县多为男性青少年参加此项活动。

除此之外，清明还有插柳习俗。这天清晨家家插柳枝于门旁，插柳之举，就是纪念的一种形式。《释名·释丧制》载：“舆棺之车……其盖曰柳”。早餐还食白煮鸡蛋，意取清（晴）明眼亮。

端午节俗名五旦五。是农历五月初五日。是我县民间三大节（端午、仲秋、春节）之一。过去店主要给伙计们赏钱，民间也互相送礼以示庆贺。端午时节，阴阳交替，疫病易生。人们为了驱邪避灾，家家都于门口插野艾，还为儿童缝制布辣椒，布桃戴在手脖上，以避病消灾。我县民间还流行着颇具迷信色彩的民谣：“端午不戴桃，死后变个大花猫；端午不插艾，来生变个猪八戒。”有的过去还张挂张天师象、锺馗画像，求神灵保

佑平安。解放后陋习绝迹。只是在这天吃粽子或水饺，以示庆祝，也作为夏收前的一次预备活动。我县一般在这个时间开镰割麦。至于纪念屈原一说，只有读书人才能讲出个大概。端午节开始于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年），辅佐怀王内修政治，外抗强秦，主张彰明法度，任用贤才。遭到奸佞陷害，长期放逐流浪。悲愤成书曰《离骚》，表达了他强烈的爱国心和对坏人的痛斥。在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情况下投汨罗江自杀。后人为了纪念他，于他投江之日（五月初五），向江中投粽子，不叫水中鱼类食其体。开展龙舟竞渡，意即群众奋勇划船救他。千百年来相沿成习，我县这个风俗也有此意。所谓风俗者，乃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汉书·地理志》：“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意即随自然条件不同，形成的习尚叫风；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

习尚叫俗。我县因没有江南的水和船，所以没有龙舟之举，但用苇叶包粽子（黍米或大米和大枣），亦有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之意。屈原已被定为全世界纪念的爱国文化名人，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为了使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应当让人们了解这个节的来历，抛弃迷信之举，继承纪念爱国诗人之意。

中秋节，是东河民间一个大节，因时间是农历的八月十五日恰值秋季的一半，故名中秋，也有的写为“仲秋”。概古时常以伯、仲、叔、季，做为序列词数来用，仲秋意为秋季的第二个月。

秋季是收获的季节，农民的辛勤劳动，将得到大自然的优厚报酬。过去常说：“七月十五定旱涝，八月十五定干戈”。农业大丰收了，又没有战争，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所以人民兴高彩烈地来过中秋，庆丰收。

中秋之日，酷暑已退，嫩寒初生，晴空万里，水天一色。使人们久受酷暑压抑的精神，获得了

解脱，心旷神怡。特别中秋之夜，金风送爽，玉露生凉，碧空如洗，皓月似盘，阵阵花香、果香，更令人陶醉。所以，从晋代开始，民间已有赏月习惯。到唐宋元，已风行全国。宋人《梦粱录》载：“天街买卖，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终晓不绝”。汪洙《中秋》诗：“秋景今宵半，天高月倍明，南楼谁宴赏，丝竹奏清声”。唐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诗：“中庭露白树棲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宵月夜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这些诗文，都描绘了民间过中秋的盛景情怀。

中秋节月圆花好，景色宜人。全家人团聚在花前月下，望着圆圆的月亮，吃着圆而甜的月饼，欢庆合家团圆，祝福不能团圆的亲人，万事如意。特别三十年来，一条海峡使不少人家骨肉分离，望眼欲穿，就更使人们触景生情，望月兴叹。把盼望全家团圆和祈求祖国统一，溶在了一起。月圆、家圆、国圆，已成为中秋赏月的一个新的话题。多少年来，奶奶讲给孙子听的神话故事，已

被爱国统一的新内容所代替。“空言有泪不轻弹，中秋月夜依曲栏，天际思亲归未得，闲中红豆忍相看。”“异地月华园，离愁秋更牵。虽然江山丽，何似故乡烟。”“金风送好音，何时共赏团圆月？碧海连清影，此夜相思骨肉情。”这反映了海内、外人们盼统一，思团圆的心声。这字字血，滴滴泪，是欢庆中秋乐章中的一个不协和的一支短暂的插曲。“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回”（康熙诗）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在有关中秋月饼的故事中，蕴含着强烈的爱国民族感情的传说，屡见不鲜。东阿民间，也流传着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故事。至元八年（1271年）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建立元朝后，为了防止人民反抗，采取民族高压政策。每十户汉人中，派一名蒙古人监督统治，作威作福，为了防止人民造反，收缴了一切私器，十户合用一把菜刀，用铁链锁住。岂知压迫越重，反抗越大。元末农民革命领袖朱洪武、刘伯温，秘密串连，发动群众，做推

翻元朝的工作。为了号令人民一致行动，于中秋前夕，和制月饼商人商定好，每个月饼中藏一杀字，作为统一行动的信号。果然在中秋赏月吃月饼时，一掰开月饼，看到杀字，愤怒的人民，一起行动，将派驻的蒙古兵杀死，揭竿起义，燃起了元末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使这个只知弯弓射雕的天骄王朝，只维持了九十七年，就被人民推翻了。

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异族建立的统治王朝——清朝，当权者吸取了元朝覆灭的教训，采取了怀柔政策。康熙、乾隆皆六下江南，虽然一为励精图治，一为游山玩水。但终究是我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次三巡时，八月十五在杭州赏月吃饼，月美饼甜，边吃边赞：

“好月，好饼，中秋良宵也”。此后，就把中秋吃的甜饼改称月饼，开始在民间流行。其实，月饼的名称，元朝就有了。元周密所著《武林旧事》中，就称中秋圆馅甜饼为“月饼”，只是没有在

民间叫开而已。

东阿民间，中秋节前，亲友之间互相走访。有的拿肉，有的拿酒，有的拿水果，但月饼是不可少的。月饼是专供中秋节用的食品，取团圆之意。从八月初六、七直到十五，送礼者络绎不绝。只是这次送礼，多在朋友和新亲戚之间，不象春节那样，长幼分明，新老皆到，也不行什么礼仪。酒宴上，鸡是不可缺的佳肴。十五一过，一切恢复正常，但在古官屯等乡，十六日为中年媳妇走娘家的日子。

### 五、缠脚与放脚

东阿，四十岁以下的妇女，则是天足，五十岁以上的几乎全是缠过的脚。有的缠了放，有的放了缠，所以有的象地瓜，有的象萝卜，打着时代的烙印。真正的三寸金莲，还得往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中去找。

有人问缠足始于何时？东阿缠足止于何时？

古时候，人类为了和大自然搏斗，是不缠足

的。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男权的确立，妇女地位逐渐下降，成为男人的玩物。她们为了取宠于男人，想出种种办法。如官妃为了取宠皇帝，“插竹引羊”。有“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之说。缠脚的兴起，也是妇女惨遭虐待的一种。

五代时，南唐后主李煜（937—978），袭父李璟帝位后，整天沉溺于酒色，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为了取乐，在宫中置以金莲，令宫女窅娘，以帛缠足，使天足骨折变形成新月状，穿素袜，舞于莲花中，回旋有凌波之态。窅娘纤丽善舞，再加缠足后的疼痛与纤小，踏在莲间或莲上，更加颤抖摇曳，取得后主赞赏。其他宫女，认为小脚美贵娇雅，竞相效仿。后来传到民间，遂形成缠足陋习，给妇女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曾下诏禁止。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也曾下令禁止。辛亥革命后，缠足之风日衰。但在东阿，影响不大。只到共产党来了，

人民政权建立后，才逐渐禁绝。

东阿缠足陋习绝迹，是在1953年。

过去男子找妻子，把脚小做为一个条件。小脚的才算美人，形容脚美谓“三寸金莲”。新媳妇到婆家，一下轿，看的人先量脚。成语中“评头品脚”即此意也。大脚姑娘有时就只好寻婆家，可见这一陋习的毒害之深。

在过去，七、八岁的女孩就要缠足。把好好嫩骨，用布帛缠紧，使其变形，走起来一跛一拐，痛苦难言。有不少文人墨客，却还美其曰“步步生莲花”。还有的“莲癖”专门研究缠足学问，把脚缠的美的标准，归纳为灵、瘦、弯、小、软、正、香。还要讲究形态、神气。形、质、姿、神俱美方为最佳。形为纤、锐、短、薄、翘、称；质为轻、匀、洁、润、腴、香；姿为娇、巧、艳、捷、稳、俏；神为闲、文、超、幽、韵、淡。两脚缠的细长，好比笋尖叫“钗头金莲”；两脚缠得“底窄背平”好比弯弓叫“单叶金莲”；两脚缠得头尖且巧，好比

菱角叫“红莲香莲”；中间垫高底叫“穿心金莲”，后边蹬高底叫“碧台金莲”。脚超三寸，鞋帮没楞角鼓起来的叫“锦边金莲”。脚丰而不肥，好象鹅头的叫“鹅头金莲”。两脚端正走路内八字叫“并头金莲”、外八字叫“并蒂金莲”。还有专门的书籍《缠足图解》、《香艳丛谈》，《方氏五种》等。要达到尖非锥，瘦不贫，弯似月，小且灵，软如烟，正则稳，香即醉的程度，是不容易的。有不少文人墨客，写出了不少赞小脚诗文：“凌波步小弓三寸，倾国貌娇花一团”；“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足蹑红丝履，纤纤作细头。”有了帝王的提倡，文人的赞美，形成了一种风俗，妇女争缠足，愈小愈好，再大的痛苦也得缠。有的地方还举办赛脚会，找神品金莲。东阿城里，一家富户，明朝时举办过脚赛。民间过春节时，妇女到一块，也是争比小脚。忍受着皮肉之苦，含泪而笑。至今，有些村中的老太太，还戴着硬壳卷，穿着木底小鞋，保留着过去的头饰和足履，

使人看了，和披肩发、高跟鞋相比，确有隔世之感。

要改变千百年来形成的陋习，的确是不容易的。现在，如果还叫哪个女孩缠脚，恐怕是办不到的吧！这就是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前进。

新时代的妇女们，你们是幸福的！

（未完待续见下辑）

## 对古志书中有关东阿记述有误的校勘

丁小石

在地名普查中，笔者为撰写《东阿县地名考略》曾普查古人著录中有关记述，发现不少讹讹处。为避免今后以讹传讹，特将它们列举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关于东阿命名来历，发现有两部志书的记述不符合史实。一是《泰安府志》说：“东阿，秦属东郡，汉置东阿县。盖以阿属东郡而立名。”按，东郡设置时间在后，而东阿地名出现在前。此说显然有误。二是《阳谷县志》说：“后魏时城

东迁，始称东阿。城迁而井（指古阿井）不能迁也。”按，东阿地名早在秦朝已经确立，说后魏始称东阿，显然把时序颠倒了。谬误不言而明。

二、关于东阿县徙治新桥镇的年代，发现有三部志书有误。一是《山东通志》卷一沿革表和卷十八古迹，均记为“绍兴二年”，误。卷十九，城池，记为“绍圣三年”，尤误。卷十四，沿革表，记为“天会十一年”，与金史相符。按，

“天会”乃金太宗年号，其十一年相当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年，即公元1133年，是年东阿县徙治新桥镇（今旧城）。“绍圣”乃北宋哲宗年号，其三年相当于公元1096年，其时金尚未立国。二是乾隆年间刘沛先、郑廷瑾编《东阿县志》，记为“绍圣二年”，亦误。三是民国周竹生编《东阿县志》记为“绍圣三年”，亦误。“绍兴”与“绍圣”一字之差，为时相隔三十七年之久。

三、关于谷城县的隶属，发现有两部图书有误。一是顾颉刚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册二，第

9—10图，秦，把谷城隶属济北。按，秦置三十六郡，后增为四十郡，其中并无济北郡。二是道光年间李贤书编《东阿县志》沿革表，记为：“西汉，谷城隶属济北郡”。按：西汉时亦无济北郡，所以说两书均误。

四、东阿县名一直相沿未变，李贤书编《东阿县志》沿革表却说，唐天宝十三载更名“紧县”，宋时亦称“紧县”，元时称“中县”。清朝学者叶圭绶著《续山东考古录》时已指出其谬误浅薄可笑。按“紧”和“中”并非县名，而是宋制以户口多少经济发达程度为标志划分县的等级：三千户以上的县曰“紧”，一千户以上的县曰“中”。盖李氏昧于此，误以为更名。

考证地名，所以强调原始依据。古人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话对于作考证文章的人来说，特别不可不察。否则，闹出笑话事小，有损史实贻误他人事大。

一九八六年九月写稿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东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作者 =

页数 = 179

SS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